



談橫縱國美

譯谷 任 著夫柯儒

社出版代時



談 橫 縱 國 美

譯 谷 任 賢 天 神 儒

年 九 四 九 一 · 社 版 出 代 時

Ю. ЖУКОВ
АМЕРИКА СЕГОДНЯ

Перевод Жэнь Гу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美國縱橫談

著者 儒 柯 夫

翻譯者 任 谷

發行者 姜 椿 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ВРОСНРУВСО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五〇〇〇冊）

目次

一 「經濟」繁榮「圖」.....	五
「笑下去吧」.....	五
罪人罪證.....	一〇
驚濤駭浪的商業圈.....	一五
「少吃」運動.....	二一
向外面謀出路.....	二三
金圓・原子・廣告.....	二六
「勝利」引起了危機.....	二九
二 「大商業」的政權.....	三一
亦官亦商.....	三二

「金邊制帽」的任務……………三六

人民要生存……………四〇

向人民宣戰……………四二

州官可以放火……………四四

三 被收買的筆……………四八

寫文章和賣啤酒一樣……………四八

獨佔資本的喉舌……………五〇

『不讓他們聽到真理』……………五二

「紐約時報」……………五五

「紐約時報」巡禮……………五七

偏袒和『人咬狗』……………六四

真理終會聽見的……………六七

四 好萊塢屋簷下……………七一

註冊商標——『好萊塢製』……………七一

五

法西斯的陰影

- 一舉兩得……………七三
- 「電影消防隊」……………七五
- 「與我同行」……………七八
- 美式生活的內容……………八〇
- 不願出賣靈魂的人……………八四
- 倒行逆施……………八八
- 好萊塢事件……………九二
- 莎士比亞左傾……………九四
- 左迫害下鬥爭……………九七
- 傳佈愚民「文化」……………一〇四
- 暴徒訓練所……………一一〇

六

「美國進步公民」

- 『爲什麼不能一起過日子』……………一一三

現實的政治課堂·····	一一五
「驚人成就」·····	一一七
羅斯福不死·····	一一九
人民的聲音·····	一二二
華萊士——人民的希望·····	一二五

一 經濟「繁榮」圖

「笑下去吧……」

初初一看，這一年來的紐約，好像沒有什麼改變：在那狹小而陰暗、充滿汽油味的曼哈頓街頭，依然是成羣結隊的汽車；依然是燈燭輝煌的百老匯；依然是頭條消息報道着司空見慣的暗殺或參議員的新反蘇演說的小報。像一年前那樣，白天，飛機在空中用烟霧寫着：「請飲白雪可樂！」而夜裏，當飛船打從摩天大樓的屋頂穿過時，放出電光的信號：「請飲雷諾啤酒！」祇有那坐在四輪車上，沿着「普拉茲」大飯店的行人道駛來駛去兜售拷貝鉛筆的、穿着綠色軍裝的、陰鬱斷腳的殘廢者，在胸前掛了一付新的厚紙板，上面寫着：「笑下去吧！」

但是瞧，過了一個禮拜，又是一個禮拜，你鑽進這個城市的日常生活裏，細細觀察一下周圍，同人們談談。寒熱病一般的紐約的喧囂，再也遮不住你的眼睛，那時候，你馬上會看出，這一年來，此

地有了多大的變化，——有了不祥的、使一般普通美國人憂慮的變化。這些變化愈大，美國的宣傳便愈加努力去隱瞞它們，而這種宣傳也愈多依賴符咒的幫忙，就像那一心想整頓自己事業的來自第五街的斷腳殘廢者一樣。美國的宣傳硬對居民說：「笑下去吧！別想失業的威脅，忘掉物價高漲，別注意反動份子的攻擊。繼續笑下去吧，管他媽的！」

可是在這些日子中，甚至那些至今還不能不相信卑鄙的、賣兩分錢一張的赫斯特系報紙「每日鏡報」，或同樣卑鄙的「每日新聞」的美國人，臉上也浮起了無可奈何的苦笑。

有一次，那許許多多落腳在城中區（Down Town）的陰暗屋子裏的小工廠的一位技師對我說：「您想想看，我的工錢連糊口也不够，還叫做什麼生活？您問我，我們廠裏的工人不上戲院？對不起，這可是一個奇怪的問題。我們從前去吃早點的咖啡館，現在也去不起了。現在每人都從自己家裏帶一片麵包來，這樣便宜些。」

有一次，我碰見一個海員，他在美國「亞美利加」商船隊的旗艦上服務。我請他講講怎樣做他的實際預算。他高興地同意了：

「啊！以我們的收入來作統計，並不難！……」

他拿起一張紙頭和鉛筆，開始計算了。

「先講收入。繳了捐稅之後，如果海員不在國外的港口亂花錢，那末他手中，每月大約可以剩一百七十五元。再講支出。我底家庭，幸而不大：我、太太、和一個孩子。我們每月付四十元房租；應當告訴你，照我們這兒的價錢說來，這是很便宜的。飲食——最簡單、最便宜的——像我這樣的家庭，每天也要四元，一個月就得花掉一二〇元。所以，還剩下十五至二十元作其他開銷……我們的弟兄，最怕害病。看一次醫生，得付三元；假如要請醫生上家裏來，那就要付五元了。而海員本人，假使他是國際工人會的會員，那末他可以免費上醫院看病。但要是你的太太或孩子病了，只好靠上帝保佑了！孩子上一次醫院，每天最低要花掉六元至八元。去一次私人醫院，花上十元至十二元已算是最好了。前些時候，我去醫牙齒。我拔去兩顆牙，安上了三顆磁牙。僅僅如此，便弄得我幾個月才能付清：我該給牙醫生六十五元……我的女兒在小學唸書。十六歲以前她可以免費上學。但以後應當送她進高等學校了。高等學校的免費名額是有限的，所以我們的弟兄，很不容易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兒去，特別是黑人、猶太人、義大利人。但是進不免費的高等學校，每年要為他們花去六百至二千元。

……

當你讀到有關合衆國今天內部經濟狀況的官方統計資料時，便不禁要想起這兩次訪問。美國的統計，出於聰明人之手。他們善於在數字上玩弄玄虛。但事實是無情的，你瞞不了它們。比方說，美國

的宣傳向全世界誇口道：合衆國現在已有破紀錄的「就業」。據官方統計，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美國「僅有二百四十萬人失業。所有其餘的職工，似乎都「就業了」。這個含糊糊糊的術語，意味着付予若干工資的任何就業。但如果我們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有一百九十四萬九千人，每週祇工作一小時至十四小時，他們也一併歸入「就業」之列。有七百八十一萬「業者」，每週工作十五小時至三十四小時。二百十八萬四千一人「有職業，却無工可做」，——在美國的統計中，就有着這樣的圖表。然而無論是第一種，或第二種，甚至第三種，美國的統計學家都不會列入失業或半失業的範圍，所以他們都「就業了」……

但是，假如一個工人，他能整週從事生產，並且有額外工作，尙且迫不得已，要放棄一切最必需的東西，並且爲了使出大相抵而每分錢都得計較一下，那末，不難想像，那些，每週工作一（！）小時至十四小時的「業者」，會處於如何困難的境地。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每一次物價上漲，馬上就成爲工人區裏熱烈討論的主題：人們已無能爲力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在「紐約時報雜誌」上，讀到一篇對於這些日子最能說明其特徵的文章——「物價爲什麼漲？各有各的理論」。這篇文章的作者，故意裝傻，而竭力把物價上漲說成爲不解的謎。

他寫道：「從前，你們花五塊錢去買蔬菜，必需帶一輛手推車。而現在，你們可以把所有買來的東西，藏在外衣口袋裏，並且還會剩下一個地方來放手套。誰也不會懷疑，雞蛋與肉的价格將是最近美國選舉中的基本問題。物價上漲，其過在誰呢？……」

以下作者又密密編結了一幅文字的繡花圖，而盡力把這個簡單和明白的問題弄得含糊不清：

「一位議員認為，一切過錯在英國人，在租借法案，在對英商務條約。另一位議員以為，全在於戰爭時期，美國有許多家庭習慣了比以前吃更多的肉、更多的黃油、更多的雞蛋。民主黨員罵共和黨員取消物價管制。相反地，共和黨員則控訴民主黨員造成通貨膨脹。工人們責備企業家，企業家責備工人。社會主義者責備資本主義，城市的居民責備農人，農人責備職工會，而贊成通貨膨脹的人們，則將一切過錯推到故羅斯福的對外政策上。有些人又到國外去找罪人，他們說「俄國的陰謀」……」

然而，這位「理論家」也無法把物價飛漲得如脫韁之馬的真正基本原因完全隱沒。爲了多少要表示一點自己的論斷客觀，他不得不漏出：

「有一個（！）扛夫控告兩個人，說他現在因爲他們要付一塊三毛五分錢吃一頓早餐，而戰前只要六毛錢。照他的意見，這是杜魯門和塔虎脫做的好事。用他的話說，只有華萊士被選爲總統的時候，才能改變這種情勢。有一個（！）美國人說，要是沒有共和黨員，那末黃油現在只賣五毛五分錢

「磅·共和黨，照他的意見，就是一羣大企業家，高物價和巨額利潤的黨。」
的確，現在在工人區，在手工業者、公務員，即所謂「白領子」居住的地區，不管同誰談話，到處你都可以聽到直接而明確的回答：物價瘋狂上漲的真正罪人，是獨佔資本、大公司、托辣斯、以及他們的政治代理人。

罪人罪證

美國的資本家們，發了空前的戰爭財。可以說，在全部美國歷史上，無論什麼時候，獨佔資本所賺的錢都不及這次戰爭多。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二屆會議上，蘇聯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對着那些靠販賣軍火發財的獨佔資本頭子，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毋容辯駁的數字，這些數字明顯指出，美國的獨佔資本家把戰爭當作空前利潤的來源。

維辛斯基說：「如果把戰前五年（從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五年（從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作一比較，可以看出，戰前五年內，美國所有各大公司的利潤，除了捐稅外，計一百五十三億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年間，這些大公司的利潤（繳了捐稅之後），達四百二十三億元。據商務部統計，戰爭的六年內（從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五年），這些大公司的純利，計五百

二十億元。這利潤，是靠了人血、靠了被破壞的城市、靠了千百萬爲自己陣亡的親人而哭泣的孤兒與寡婦賺來的……。」

這之後，受獨佔資本津貼的美國報紙，發出了多麼粗野的叫聲！惱羞成怒的獨佔資本家，瘋狂得忘形了。屬於「報王」赫斯特的「美國雜誌」咆哮着說：「不管怎樣，他媽的，美國商業帶來多少利潤與維辛斯基無關！」有些報紙又竭力對維辛斯基所引的數字，表示懷疑。但這更顯出他們的無恥。蘇聯代表團團長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又列舉了更爲詳細的資料，說明美國獨佔資本家怎樣發戰爭財。

維辛斯基說道：「事實上，利潤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也許，當我說美國獨佔資本將五百二十億元淨利落到自己的腰包裏時，我真的攪錯了嗎？不，我沒有錯。我手頭有一份「統計月報」，我現在把它讀出來：

A：戰爭期間，美國的銀行存款總額，已增至六百十億元。——根據一九四七年五月份「每月統計公報」（聯合國統計部出版）。

B：據美國商務部機關刊物「現代商業調查」。一九四六年四月號，美國私人企業的利潤，在繳納了一切捐稅及除去國外投資的紅利以後，可由下列逐年的數字來說明：

(單位百萬美元)

一九三四——〇、八六〇
一九三五——二、一三二
一九三六——四、一六二
一九三七——四、五六八
一九三八——一、九五六
一九三九——四、七三五
一九四〇——六、一一二
一九四一——九、〇六七
一九四二——九、〇九八
一九四三——九、八七五
一九四四——九、六八一
一九四五——九、〇二〇

C：整個戰爭期間，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利潤計五百二十八億五千三百萬元。

D：當時的戰時動員及復員局長史蒂爾曼，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致總統及國會的報告（第八次）中，談到利潤的部份時說：「私有企業家的利潤，繳納了捐稅之後，已達歷史上的最高水準，雖然由於復員關係，某些工業部門的利潤水準較低，但這是因為大量拋售成品所致。」

華爾街的雄辯家被駁倒了……

戰時超額利潤的瘋狂增長，進一步加強了美國資本的集中。強大的石油、鋼鐵、汽車「帝國」，併吞了他們的競爭者後，愈加龐大了。

一九四一年，此地有三十二家資本在十億元以上的公司。一九四四年，這種公司的數字已增至四十。戰前在企業獨佔組織中，僅有三家大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美國製鋼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是擁有十億元資本的。現在，在十億元資本的大公司中，又加入了杜邦公司、福特公司、伯利恆製鋼公司、「美孚油公司」、「寇蒂斯·來特飛機公司」^①。美國的黃金儲備，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已增到天文數字——二百五十億元。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間，美國的工業生產量，增

①「寇蒂斯·來特飛機公司」的發達史，是戰時「景氣」的「英雄們」的典型。戰前該公司有八千工人。一九四三年，工人數字已增至十八萬，即增加了廿倍。「寇蒂斯·來特飛機公司」的資產，在美國最大企業公司中佔第四位，估計有十二億九千五百萬元。美國的資本家在戰時就這樣賺着錢。——原註。

加了兩倍有餘，而在以前的二十年間，它祇增加了百分之三八。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一九四三年以後，美國的畸形生產開始走下坡路了，但暫時它還沒有在獨佔資本的收入中表現出來。一九四六年，繳付捐稅以後的獨佔資本的純利，達一百二十五億元，而一九四〇年為六十一億元。一九四七年，獨佔資本的利潤更加多了，繳付了捐稅之後的純利達一百七十億元。每付出一元工資，就有二角六分的利潤！

在許多分攤紅利的大宴席上，香檳酒像河水一樣流着。爲了使老百姓吃驚，企業家所定的酒餚不亞於古羅馬饕餮者的宴會。在芝加哥肉大王的年宴上，邀請了一千八百五十位客人，由艾森豪威爾親自主持，他，艾森豪威爾，早已成爲金元官庭中，爲了追求名望的獨特的排場將軍[⊖]了。拍馬討好，高興得忘形的御用報紙寫道：「每一位客人都饗以四磅重的牛排。紐約還舉行過一次招待「五十位第一流人物」的非常盛大的宴會——這裏邀請了五十位最有名，最得寵的企業家，其中有「大通銀行」的要人奧得利區、納爾遜·洛克菲勒、亨利·福特第二、電影巨頭艾里克·約翰遜、兩位威爾遜「通用電氣公司」經理和「通用汽車公司」經理、銀行家小梅農等人。邀請他們的紐約州長杜威，與高采烈

⊖ 指用金錢聘請參加宴會，以撐場面的政府退職要員或將領。

地開始了他的演說：「歡迎你們，新政的犧牲者。」而「五十位第一流人物」對於這次嘲弄式的紀念故羅斯福，則報以友好的呼叫。

驚濤駭浪的商業圈

但其實「五十位第一流人物」也不是不很高興的，所有這些隆重大典，到底還是帶有宣傳性質，正如第五街上那斷脚小販胸前掛的可憐招牌一樣。他們心神不定，並且不能不注意，在驚濤駭浪的美國商業圈子中，正存在着精神浮躁、缺乏信心和不穩定的氣氛。這裏愈來愈普遍地開始談論行將到來的經濟危機，而股票市場，則以癡癲性的動盪，以那些暫時似乎還很繁榮的公司股票的狂瀉，來反應這類談話。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市價損失的總額，已達二百億元。在一九四七年的四五月間，股票又發生了劇烈的跌價。股票的劇烈跌價，在六月二十四日特別明顯。最後，七月二十九日，在紐約股票市場上，又記錄了一次駭人聽聞的新「地震」：一天當中，市場上的股票價格，下跌了十億元。這一天聯邦儲備局把他們所得的情報，分析完畢之後，得出一項結論，美國的工業生產正在慢慢地而且是不斷地低落；工業生產指數在三月份等於一九〇，四月份為一八六，五月份為一八五，六月份為一八三（以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的平均基數作一〇〇計算）。此種減縮，到了七月份的上半月

仍然繼續着。它延及輕重加工工業及採礦工業。聯邦儲備局宣佈他們的結論說：「重工業的出品減少，是由於五金及金屬成品的需要減少之故，而輕工業的生產量的減少，……反映着這些貨物的國內需要的減少，以及輸出方面的某些減少。」

一九四七年秋天，當我第二次到紐約的時候，我得以將美國的錢幣與物價的實際情況，與一年前發生的一切作一比較。而每一步，我都得到了不容分辯的證據，說明物價狂漲，國民的購買力降低，每一個普通美國人對於明天的恐懼和無信心的增加。

據美國勞工部於十二月十二日公布的官方統計，美國批發價格的指數，較之一九四六年六月，已上漲了百分之四二·三。單是這年的五月至九月，肉類價格便漲了百分之二十一，雞蛋漲了百分之二十九，黃油漲了百分之三十。勞工部長許維林巴赫本人也在十二月一日衆議院貨幣與銀行問題委員會上說：「物價已達驚人的比例。最低的生活價值，已超過任何時候。家庭主婦花二十一元買來的物品，其數量只值戰前十元，值一年半前的十五元。」

一九四七年十月下半月，我看見百貨店前一羣驚慌的家庭主婦和長蛇陣：他們在爭購砂糖，因為外面謠傳，物價馬上要狂漲了。十月二十二日，紐約各報頭條消息說：「被恐慌籠罩的婦女們，爭購砂糖，以備不時之需。」被記者包圍的全國零售商協會主席達哥斯丁諾，無可奈何地藏起了滿足

的笑容說：

「我的倉庫中，一包糖也不剩了。禮拜二那天我有正常的三星期存貨，但禮拜五就全銷光了……。」

在小城市中，顧客們的恐慌，還要厲害。在聖路易斯城及其他城市中，人們不僅爭購砂糖，而且要女人的絲襪、汽車胎、及其他貨物：到處傳佈着謠言，說要實行配給制度了。弄得商務部不得不對國民發出特別呼籲——「克服恐慌」。

不難猜出，這恐慌是由靈活的投機份子造成的……

爲了提高物價，故意造成市面短缺的現象。在紐約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們，一九四六年夏天許多汽車商行把數千輛新車子藏入森林和無人之區，以待取消汽車的限價。而這時候的紐約，便很難買得一輛車子了。假如你找到一輛待售的卡車，商人就要你在官價之外多出五百元，爲了……司機台上裝有一只小貓。關於這種物價上所玩的花頭，前物價管制局長漢德森曾在「大西洋月刊」中特別敘述過。

據一九四七年二月公布的資料，到一九四六年底爲止，美國存貨的總額有三百四十九億元。到一九四七年底，據「經濟彙報」(Economic Notes)報導，堆存在倉庫中的各種物資，達五百億元！

爲更加明白這數字的意義起見，我要提醒一下，還在不久之前，在一九三三年，美國全部製造工業的生產總量僅值三百億元。

有一個時期，許多美國人叫囂道，戰時聚集起來的儲蓄，在許多日用必需品缺乏時，對於市場的平衡有很大作用。的確，美國儲蓄銀行中的存款，已從一九三九年的一百四十億元增至一九四五年的六百六十億元。然而，如將這問題仔細研究一番，就會明白，此項儲蓄主要是屬於一小部份生活不成問題的國民的。據「統計協會」的資料，「被雇用而工作的人們，有三分之二在戰時沒有任何儲蓄。」另一方面，據「經濟彙報」的報導，在一九四六年第二季，全國的儲蓄已減少了二百億元。很明顯的，不得不動用自己的儲蓄的，首先就是中小戶頭：他們也是日用必需品的主要消費者。而富豪和商人則保存着自己的資本，照「商業週刊」的說法，他們「運用自己的大部份積蓄以獲得進益，而不是爲了購買貨物。」

「美國新聞」(United States News)在八月二十九日分析儲蓄的實際情形時，用憂鬱的調子寫道：

「大多數美國家庭都用光自己所有的錢……相當少數的人，才可以儲蓄金錢以防不測……退伍軍人主要都靠他們的戰時儲蓄過活。所以，當我們研究羣衆購買力的問題時，不能以儲蓄作根據，……

高價的商品市場，只能依靠那每年收入在五千元以上的百分之十的美國家庭。」

此外，應當附帶說一說，美國所付的薪金與工資總額，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一九四六年，此項數字為一千零六十億元，而一九四五年，有一千一百十億元。製造工業的工資總額，在一九四六年比一九四五年減少了百分之十，比一九四四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

單是因爲減少工作週，取消包工制，取消額外工作時間及星期工作的報酬，據產業職工大會的統計，美國勞動者的購買力每年便減少了一百二十億元。幾百萬美國人完全失去了工作

美國人民的購買力，已大爲減低。早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前物價管制局局長漢德森在國會經濟委員會上即已指出：

「自從一九四六年六月廢除了有效的物價管制後，物價與工資便告脫節，造成儲蓄和購買力銳減，以及大多數美國人的實際消費的減少。這現象相反的一面，當然，就是利潤的大量增加……。現在，國民購買力的分配情形是我國歷史上最古怪的。這種情況，引起零售商業的範圍大大減縮；其實銷量已比最旺盛的一九四六年二月減少百分之十……這種消費的減少是可怕的徵兆，是恐慌不安的

○ 據一九四八年春天美國公布的資料，僅因取消物價管制，便使美國國民的購買力減低了三八〇億元。一九四八年此地的實際工資，已比一九四五年減少了百分之十五。——原註。

真正原因。在我們的制度下，如果消費減少的話，生產量是不會長久擴大的……。」

下面一件事實也值得注意：據「聯邦儲備公報」(Federal Reserve Bulletin)的統計，僅一九四六年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各百貨公司未售貨物的積存，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許多商號不得不向廠商取消他們的定單。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商業週刊」指出：「將來記述日益逼近的危機的歷史家們，一定會指出，本景氣始於商業的不穩。」

美國的商人們，為擴大無人問津的商品銷路，運用了怎樣的狡計！一九四七年秋天，在各大時裝公司的主使下，美國發明了一種新製服裝——長裙子。彷彿得了信號似地，一切報紙都開始大捧這種式樣。他們寫道，這種式樣能鞏固道德，會有許多實際的便利等等。但美國女人堅決反對這種式樣。台薩斯州多拉斯城兩個孩子的母親波比·伍德華，領導了「新式樣」的反對者，組成一個「長裙之敵」俱樂部。有一千三百名婦女登記加入了這個俱樂部。一週之後，在所有四十八州中，都組織了這樣的俱樂部。婦女們組織示威遊行，高呼口號：「打倒新式樣，救救金錢！」。在瓦多斯塔城，男子們也加入這種遊行，他們組織了一個「破產丈夫聯盟」。美國的報章雜誌，一致把這遊行消息當作奇特的笑話刊登。當然，在這一切舉動中，有特別的，純美國式的好奇成份在內，然而，它們也有它們自己

的經濟內幕。這一個小小的例子，相當說明了今天的美國，那裏的家庭在節多慶一馬行，節節不真考慮十次。

「少吃」運動

死硬派的共和黨員塔虎脫，那臭名昭著的反勞工法作者之一，決定在援助商業方面，也供獻一點自己的力量。他宣佈了一套毫不聰明，而非常奇怪的方案。

他在九月十二日加里福尼亞的一個集會上說：「先生們，你們吃得太多，所以糧價上漲，所以你們沒有餘錢買旁的東西。你們必需少吃！」

於是塔虎脫在「少吃！」的口號下發動了一個運動。這運動，無疑地，終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報紙上曾刊登過許多照片，顯示大隊警察，在洛山機街上保護這位激起市民公憤的不幸的參議員，而大眾的示威者，高舉着標語：「塔虎脫的計劃——是加窮人的稅，奴役工人，讓勞動者飢餓。」警察逮捕了拿標語的人們，然而，却沒有辦法制止遊行。

可是，過了些時候，「少吃！」的口號，却在華盛頓方面獲得了支持。杜魯門宣佈了「節省食品」的計劃，這一次的藉口是「援助飢餓的歐洲」。規定每週有兩天為素食日：人民在星期二這天不

得吃肉，星期四不吃雞和蛋，每天節省麵包。美國統治階級的僞善的大儒主義，是沒有限度的。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上，我讀到一則來自伊利莎白城的消息，說愛犬者俱樂部主席佛蘭克·特羅爾，為響應杜魯門的建議，呼籲所有飼犬家把素食日擴大到……四脚的「消費者」。該報用最嚴肅的態度說，此項建議已獲得牲畜保護會的代表楚克爾贊同，這位代表說：「假使每週有一天祇給狗吃牛奶、魚和蔬菜，這對於牠們的健康將有莫大利益。」

勞動階層對這個白宮倡議的態度，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報紙上不得不指出，家庭主婦對於總統的呼籲表示驚奇和憤慨。她們說，即使不實行節約，魚和肉早已是他們家中的稀客了。

另一方面，總統的呼籲也引起了農人、肉商、飯店老闆們的抗議，他們對這種限制表示不滿。值得注意的是，是規定了素食日不但未使物價下降，而且反引起新的猛漲。杜魯門是在十月一日早晨宣布自己的草案的，當天下午，小麥價格便跳了七分錢，而造成新紀錄——每蒲式耳賣二元九角一分，二十三天以後，芝加哥的小麥已賣到三元零七分錢一蒲式耳了。雞蛋及其他食品的價格，也都猛烈上漲。

結果，星期四禁售鷄子的命令祇得取消。漸漸地，因素食日而起的一切騷擾也平靜下來了，雖然素食日在形式上還保存着。

向外面謀出路

美國最有遠見的經濟學者，早就敲起了警鐘，他們警告說：高抬物價的瘋狂投機，將招致慘禍。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報載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領導人諾爾斯，特往白宮，「與國家首腦討論當前局勢」——與杜魯門會談之後，諾爾斯記者說，局勢非常嚴重。

接着杜魯門本人也對物價的高漲發表了演說。

杜魯門勸告資本家自動減價，並以危機的威脅來恫嚇他們。然而，無疑的，總統的忠告絕不會有任何結果。過了八個月，當杜魯門出席國會非常會議的時候，不得不承認美國的經濟局勢已愈來愈可怕了。

在一九四七年秋天召開的國會非常會議中他說：「我們已經遭遇到足以引起恐慌的通貨膨脹。而另外一件事更使人不安，就是通貨膨脹還在增強……如果不立刻採取措施，以制止猛漲的物價，那我們便開闢了走向災禍的路……。」

杜魯門建議恢復消費品的合理分配，管制市上缺少的商品的價格，擴大並加強管制輸出，限制商品市場上的投機買賣等等。「紐約時報」對於總統的這篇演講，並非沒有惡意地指出，所有這些要

，只是根據競選的考慮而出發的。

該報寫道：「杜魯門故意向國會要求他知道不會給他的權力，而且實際上杜魯門也不希望得到這種權力。」

當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國會再度召開例會的時候，杜魯門發表了第三次演說，談到日益迫近的危機的威脅。

最近來自美國的消息，證明通貨膨脹在繼續擴大，市場上的物價有了新的波動。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患了新的癩症：它害着寒熱病！美國的獨佔資本家，更頑強更拚命地盡其一切力量來擴大輸出，在其他國家中奪取市場。他們的計劃實現得怎樣呢？美國的輸出情形如何？對外貿易的前途給美國的商業說明了什麼？

寬闊的快速架空車道沿着哈德遜河好幾英里地伸展出去，聳立在離河岸有十五公尺高的紐約上空。這裏沒有十字路，只有無盡長的汽車行列，密集得像河流一樣，在第四和第五層上疾馳，直到下船塢的地方，才漸漸放慢下來。巨象一般的大卡車，以直徑達一公尺的車輪，載着重得駭人的貨物，擠往那邊去；大開着貨艙的美國出口船隻正在等候它們。在這條巨人似的河流兩岸，幾百艘準備開往世界各地去的輪船，舫碰着舫地停泊在那兒，等待裝運貨物。在更遠的停泊處，還有幾十艘挨次等待

裝貨的船隻。

當我們走過架空車道的時候，一位美國的經濟學者，向停泊船隻的一面偏了偏頭說：「這就是我們出名的「景氣」。」

他作了一個苦笑，接着諷刺地說：

「我們愛在「景氣」上打賭。這次的賭注是壓在輸出上面的。事實上，這是保持高度生產的最後一個機會了：因為國內市場在目前物價高漲的情況下，不時在減縮需求。但當海外的顧主們把最後的金元給了我們的時，會怎樣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考慮。」

不能說美國的商業界不知道，瘋狂的強制輸出（沒有輸入彌補的），最後會引起什麼結果；最後，各國顧主們將無錢可付，它們什麼東西也不能買了。在比較嚴肅的經濟雜誌中，沒有一個禮拜不刊登着文章，警告輸出的「景氣」，將必然招致不堪設想的後果。但資本主義經濟的本性，却使這些警告的呼聲淹沒在那些載送一批又一批的出口貨物到海船上去的運貨卡車的喧囂之中。

大家早就知道，商業是政治的親姊妹。尤其那把國家當做自己工具的美國獨佔組織，其政治目的是要取得世界統治權。英國的關稅特惠權在戰時就受到最嚴重的打擊，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這是防止美國資本侵入大英帝國的市場壁壘；這種關稅特權被大西洋憲章取消了。而在戰爭結束後的第二日，

美國就突然中止根據租借法案供應英國貨物，並開始有計劃的、無情的吮吸英國國庫中的貨幣存底，這同樣不是偶然的。

華爾街的外交商人，一手推開衰弱的英國對手，便侵入了英國的「勢力範圍」、殖民地、自治領。另一方面，西歐本身也被美國的商人們看中了銷售呆貨的市場。

金圓·原子·廣告

貧多無鑿的美國企業家們，爲了強制輸出，施展出一切方法，從「金元」外交和「原子」恐嚇，到各大陸上的純粹美式的瘋狂廣告宣傳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活」雜誌刊登了一套富有詩意的彩色照片，標題叫做「阿比西尼亞走向現代化」。「生活」雜誌所說的現代化這個字，是指什麼呢？它要使讀者們被那坐在沙發上的阿比西尼亞國王，一手拿着蠅拍，一手拿着美國雜誌「讀者文摘」的情景所打動。在另一幅照片中，讀者可以看見美國電影「暴風雨的天氣」的廣告招貼，這是像油煎餅一樣在好萊塢的火爐上烤出來，然後分送到全世界去的那種標準音樂影片之一。「生活」雜誌說，美國影片已在阿比西尼亞找到了廣大的銷場。可憐的阿比西尼亞人啊！

美國的外交商人無孔不入地把自己的貨物傾銷到世界各地去。一九四七年春天，我看見芬蘭的家

店主婦在赫爾新基的商店中，望着粗糙而霉臭的綠色雨衣搖頭嘆氣。這些東西都是美國商人恩賜給芬蘭，而迫使他們付出實實在在的美元來購買的「軍用剩餘物資」。一位到紐約來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孟買報紙記者說，印度政府不得不限制美國酒精、梳子和各種小東西的傾銷，因為在一九四六年，美國商人已輸入了一億七千零七十二萬九千美元的貨物到印度，而單是一九四七年的最初三個月內，便輸入了九千五百萬元。在這樣的情形下，美國人不肯把工廠設備售予印度人，是值得注意的。

美國的企業家們，對德國英美佔領區的顧主更不客氣。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國軍政府曾指定一筆總額達二億三千八百萬美元的「交易」給曼因河上法蘭克福的唯一是從的「經濟委員會」。他們依然把那惡名昭著的「軍用剩餘物資」中一切破爛得不堪想像的東西，強賣給德國人。

當德國專家來到倉庫接收買來的「物資」時，他看見了堆積如山的舊防毒面具、破皮帶、破爛不堪的被蓋、穿過的大衣和皮鞋，之後，他們又帶專家到「汽車墓」去，將那些半毀的軍用汽車指給他們看。專家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所有這些物資，完全不合市民的需要。但辯駁已經遲了。德國的商店不得接受這些買來的「貨物」。爲了不致在顧客的心目中失去信譽。它們發表了以下的聲明：

「漢堡鞋業公會敬告各界人士：近週來，本會自美國軍用物資中收進一批皮鞋，以便公開出售。惟該項皮鞋品質惡劣，不堪適用。本會特請顧客注意，今後若有不合之處，本會概不負責。」

美國的出口商，用盡一切經濟與政治的壓迫手段，在國外銷售了空前大量的商品。

下面幾個數字和事實，說明輸出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已增加到何種程度。據勞工統計局於去年（指一九四七年——譯者）八月公佈的資料，除經營農場者外，約有二百萬勞工在輸出事業中工作。這期間，在鋼鐵工業中，每一百工人有十八名為輸出而工作，在機械及汽車工業中，每一百工人有十二名，在橡膠及化學工業中，每一百人有十一名，在紡織工業中，每一百人有七名為輸出而工作。

自美國輸往國外的無線電收音機，比戰前多三倍。汽車的輸出，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半。特別是美國製造的卡車，每五輛中總要輸出一輛。美國所出品的鐵路設備，有一半以上用來輸出。火車頭比戰前多輸出了九倍。

說到美國的農業，那麼對於它，輸出的意義，比對工業更重要。在一九四七年，據初步估計，全國收穫量的百分之二十三·三，是輸往國外的其中包括農場主賣出去的全部小麥的百分之三十四·八。現在，整個外國市場所消耗的美國農產品要比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多五倍。

美國商人的伙伴們知道，從美國輸入的東西愈多，他們所受的經濟奴役也愈深。他們曾有過微弱的企圖，以關稅來阻擋和禁止輸入某些貨物。譬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會禁止輸入美國汽車。墨西哥、巴西、烏拉圭、厄瓜多爾、阿根廷、祕魯，或者乾脆禁止，或者嚴格限制輸入收音機。但這

一切禁令，或被美國商人巧妙避開，或在嚴厲的壓迫下完全被破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商業週刊」指出，日內瓦貿易會議的結果，是「美國的真正勝利」。該雜誌寫道：「官方集團，對於下列諸事實頗感滿意：六個月堅忍（！）談判結果，美國與二十個國家達成了關稅協議……。美國破壞了英國的帝國特惠制度。國際貿易組織法規，已照美國企業界所提出的反對加以修改。關於徵收美貨關稅方面，美國已得到特殊的讓步。此外，在世界貿易當中，仍保留着私人企業的原則。」

「勝利」引起了危機

擁護帝國主義的「商業侵略」方法的人們，慶賀勝利了。他們以為，跪在面前的伙伴，已是唯命是從的附庸；跟他們競爭的危險已澈底消滅；現在的美國，而且也只有美國，將支配世界市場。然而美國獨佔資本這種毫不掩飾的商業侵略，也有其相反的一面，這，華爾街自己也看得很清楚。總而言之，他們心裏明白，美國為擊退競爭者而有意採用挖盡顧主口袋中的美元存底的辦法，必然要引起對外貿易的危機。

因此，在所謂美國的商業界中，一聽到輸出開始驟減的信號，立刻就引起了非常的驚恐和神經

實。自一九四七年五月起，輸出已逐月減少。到了十月；「現代商業」指出：與五月份比較起來，輸出約減六分之一。

這些資料，在美國人看來，絕對不是意外的。他們知道，美國獨佔資本在用盡一切方法強制輸出的時候，同時也就限制了外國商品的輸入，以防他們在美國國內市場上的競爭。

「現代商業」又指出，到了一九四七年七月，法國和義大利已耗盡了美元及黃金儲備，而不得不在五月份少買糧食百分之五十四·六，少買紡織品百分之七十一·六，而全部輸入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該雜誌指出，對法義的各項設備及運輸工具的輸出，暫時尚不致削減，因為在好幾個月前已訂購了這些貨物，並且有信用貸款保證。

「現代商業」憂鬱地說：「當信用貸款用盡的時候，我們的輸出將隨着這一批貨物而立刻減縮。」值得注意的，那些未曾參戰，而且發了不小戰爭財的國家，也在加速度地耗盡他們的黃金及美元存底，而把它們轉送到美國商人的口袋裏去。據美國商務部統計，西半球各國僅在一九四七年第二季，由於對美輸出及自美輸入的不平衡，就迫使他們減少了五億美元的美金儲備。除了上述數字之外，還得加上西半球各國為華爾街賣給歐洲各國的貨物而支付的三億美元。

美國的官方宣傳武斷地說，美國輸出輸入之間的「縫隙」，可以靠「馬歇爾計劃」來彌補。但這只

是給沒有進學校的，還不能數到十以上的孩子們說的神話。「商業週刊」對於美國輸出的驟減寫道：

「不管有無馬歇爾計劃，美國的輸出是注定要低落的。根據馬歇爾計劃而發放的貸款，每年不會超過五十億美元。馬上能用的只有三十或四十億元。然而美國輸出輸入之間的裂縫，單是商品一項，每年已達一百億美元，假如再加上無形的輸出[⊖]，那就要達到一百二十億元。為填補這個漏洞，輸出遲早要減縮的。」

今天美國的老闆們，在找尋可以保留高度生產水準，可以抵禦經濟危機的經濟解決辦法中，看得如此重要的輸出「景氣」，其實情形就是這樣的。

⊖ 即資本輸出。——譯者註

二 「大商業」的政權

亦官亦商

有天傍晚，在聯合國大會的熱烈會議之後（在那會議上杜爾斯會情不自禁地厲聲叫着：「決不退到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去！」）一羣新聞記者，留在那喧鬧的、被死沉沉的藍色燈光照耀着的記者接待室中。他們坐在金屬雕花的桌子上，彼此交換着印象。一位所謂美國大報的觀察家，意味深重地說：

「不管怎樣，當金元人物講話時，這聲音總是有份量的。的確，參院激昂動人的時代及議會玩弄花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老頭兒康納利被擠走，不是偶然的。他那套舊式的姿態——用拳頭敲桌子，發着喜劇式的尖叫，講一口聰明的漂亮話——顯得很可笑了。現在是商業自己說話，自己來解決問題。這樣更明白、更簡單、也更便利！」

「My money——my diplomacy」①——屋角中一位自由主義報紙的記者，諷刺地說了一句。「但是您丟開細節吧，世界上並不全是賣出買進的。」

「不用大談哲理，小夥子！」——杜爾斯的崇拜者打斷他道：「你的報紙要做出一副沒有被收買的樣子，那有什麼意思？想想它那可笑的發行數吧！……」於是他轉向自己的同僚，繼續發揮現在美國很時髦的強國商業論。「對，我們的文明，是大公司的文明。大公司、銀行，是我們社會的發電機。華盛頓的政治天空上沒有像老摩根、或約翰·洛克菲勒、或亨利·福特一世那樣燦爛的明星，這有什麼關係呢？如今時代變了：從前是人創造公司，現在則是公司創造人。你們可以相信，他們是善於佈置力量的。你們不會想到我們這時代的一個現象：我們的商業、我們的外交、我們的軍事構成了一個多麼奇異的三位一體的同盟？杜爾斯、福萊斯特、羅雅爾，自然比不上已故的「大老們」，但這些小夥子也知道，他們想要什麼，商業想要什麼。這就是他們比參院的空談家優越的地方……。」

這段坦白的談話，很清楚地表現了今天美國上層統治階級，以及把靈魂和肉體出賣給他們的奴才們的思想特徵。強國商業論在這個集團中找到愈多的崇拜者，那末，危機便愈迫近，而「自由競爭制度」所面臨的不可避免的經濟大災難的輪廓，也就愈加明顯。

① 「我的錢，就是我的外交。」

國家機關與獨佔資本的休戚相關，錯綜勾結，自來就是美國國家機構的典型特質。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在一次公開談話中，指出了這點：

「我們的天體，像衛星一樣運動。他們從華爾街的宇宙，走進政治，然後又回到那兒，回想一下史退了紐斯的履歷吧！他的父親是摩根的寵兒，他自己也是忠於銀行家族的人，百分之百的商人。他從華爾街走進國務院，從國務院又回到華爾街去重操舊業。而他的繼承人貝爾納斯呢？他也不過是暫時爲國務院而拋開商業，現在又重新回到那兒去了。您知道，貝爾納斯同影片大王約翰斯頓的合作嗎？您可記得年老的海軍上將史坦德萊嗎？戰爭時候，他在你們莫斯科當過大使。現在，史坦德萊是泛美航空公司的經理之一。這是永久不變的循環……」

同時，在國家機關中所謂「金邊制帽」——將級軍官——的比重猛烈增加，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正如華萊士所說，在美國有一百七十餘名陸海軍高級軍官担任着高級文職。同時，也應該注意美國將級軍官的特質。美國軍隊的指揮幹部，大部份是由商人構成的。

美國國防部的首長，是最大銀行「狄隆李德公司」的前任總經理福萊斯特。美國陸軍部長羅雅

福萊斯特在一切美國的參考書中，都被列爲最有名的華爾街代表之一，他在那裏待過幾十年。這在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傑姆斯·福萊斯特就在華爾街做「李德公司」的股票交易。戰時，這公司賺了不少錢。

爾將軍，原是北加羅林拉的銀行家，他在陸軍部中也找到了金融活動的場所：戰時羅雅爾處理陸軍的財政事務，而戰後他順利地出售了剩餘軍用物資。

到一九二〇年，拚着「狄隆李德公司」招牌的銀行，要算是美國最大的銀行之一了。就自己的前程而論，傑姆斯·福萊斯特爬得很快。一九二三年時，他是這銀行的股東，一九二六年任副總經理，到一九三九年已經是它的總經理了。照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的大捧福萊斯特的「生活」雜誌的話來說，他「賺了這麼多錢，以致他可以在一九三三年很有禮貌地向參院委員會解釋，他如何通過加拿大境內的分公司來逃避股票交易稅。

以福萊斯特爲台柱的「狄隆李德公司」。與德國資本的密切關係，對於任何人都不是秘密。早在一九二〇年，美國曾通過這家銀行，貸予德國大筆款項。這家銀行，和那準備並發動了二次大戰的。德國康采恩「I. G. 法本企業公司」，有特別密切的關係。至於福萊斯特本人，那麼據「標準工業手冊」的資料，他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曾兼任「通用殼油膠片公司」的負責人，而這家公司正是「I. G. 法本企業公司」的美國分號。

這些關係，自然，也在福萊斯特的政治綱領上，留下了痕跡。「生活」雜誌爲宣揚福萊斯特的勇敢，指出道，戰時任海軍部長的福萊斯特，曾堅決反對羅斯福的對德政策，并積極阻撓供應蘇聯軍用物資。該雜誌繼稱，福萊斯特對於著名冒險家兼戰爭販子滿立德的觀點，完全表示同情——原註。

陸軍部次長，是美國著名銀行家之一，也是那家「狄隆李德公司」的副董事，特萊伯將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在一九四七年，曾企圖運動美國私人公司祕密貸給德國企業家一筆總額達十億美元的巨款。美國陸軍部長的特別副手，是一再被人指責從事投機買賣的加利福尼亞的石油工業家鮑萊。

同時，華爾街的強大特使隊，又在外交界大顯身手。當你念到美國佔領軍的統帥、美國外交家、國務院負責官員的名字時，你會又一次深信，「大商業」在這裏的指揮地位，保持得多麼穩固。

至於像商務部或財政部等國家機構中的其他部門，不消說那裏面的重要職位，也是全由美國大工業家和金融家壟據着的。

「金邊制帽」的任務

「華爾街準備讓現政府來統治世界」——一九四七年九月，華萊士在一次集會上這麼說。

但「大商業」的主腦們，顯然心中明白，目前華盛頓的華爾街特使們所推行的內外政策，不可能不引起廣大人民羣衆的反對。

因此，在大銀行家族們感到驚慌的、不安的、面臨着危機的今天，最著名的獨佔資本紛紛爭聘軍人來爲自己效勞，這是極有意義的事。

美國記者A·歇爾茨在一九四七年秋天寫道：

「華爾街閃爍着金邊制帽的光彩。這裏派來了大量高級軍人，他們被委以董事、副董事、大公司的總經理等職。摩根、梅農、洛克菲勒們，認爲最好把他們許多值千百萬美元的托辣斯的命運，交託給陸海軍將領。」

爲什麼會有這些任命呢？決不是因爲關心那些戰後無事可做的將領們。不，這裏，正如在任何其他事業中一樣，一切都跟着利潤走的。下面的事實，在美國已不再成爲祕密了，即富有軍事經驗的「金邊制帽」，担負着一個非常具體的任務：「在塔虎說——哈特萊法案的幫助下，摧毀職工會，而不受到任何反對。」

於是，「金邊制帽」們熱心幹事了。

一九四七年秋天，「塞爾斯·羅巴克公司」的總經理羅勃·伍德少將，提出一個大受華爾街歡迎的口號：「組織愈龐大，愈應該拿軍事機關作模範。」而伍德將軍正擁有不少「軍事方法」的指揮經驗呢！關於這位伍德少將，相當有名的帝國主義喇叭亨利·魯斯，曾假「幸福」雜誌的篇幅寫道：「伍德的十年軍界生涯是在巴拿馬度過的，他在那兒管理建築工人。當時巴拿馬的工人們從伍德將軍口中所聽到的一切，只是簡短的一句話：『你們解僱了』。不久前，伍德又招收了兩名將軍來幫忙自

已：華脫·佛蘭克少將將任南美洲分公司的經理；華脫·李德將任該公司駐墨西哥代表。」

曾任海軍運輸部長的海軍中將蘭德，大受華爾街的歡迎。他被派為空運公司的董事長。這一高位派給他，並不是偶然的：華爾街記得很清楚，五年前蘭德在紐約銀行家的一次集會上，談到可能發生罷工的時候，聲稱：「每一個組織者都必須槍斃。」

爭得一個「老牛」綽號的海軍上將海爾賽，離開海洋後，馬上給自己找到了兩個肥缺。他為摩根服務，受任那龐大的國際電訊公司的總經理；同時又效勞於梅路，任李勃萊公司的總經理。他這條綫的頂頭上司，是前美國國務卿史退丁紐斯，而最親近的同事則是前駐日大使及助理國務卿約瑟夫·格魯——已故的老摩根的親戚。

陸海軍的將領們，現在佔據着美國一切重要經濟部門的領導職位，從冶金工業起，一直到甘蔗園、石油地、無線電公司、及交通公司。

僅在一家屬於霍華德·休士的大陸運輸暨西部航空公司中，便籠絡了整隊的陸海軍將領。最年輕的海軍上將哈羅德·波汶，只有四十三歲，是這家公司的副經理。前美國駐非洲及中東的空軍司令班傑明·傑爾斯將軍，也被任為這家公司的另一位副經理。前美國空軍部次長伊克爾少將，則擔任重要的領導職位。

在美國無線電公司中，軍人的控制還要強大：總經理是前美國陸軍聯絡兵團團長伊格拉斯將軍；董事長是大衛·沙爾諾夫將軍；副經理兼交通主任是托瑪斯將軍；二級上將范台克是國家廣播公司的副經理；海軍中將格拉斯福爾主管無線電公司的歐洲部。

以轟炸東京住宅區著名的杜立特爾中將，已「着陸」担任「亞細亞」石油公司的副經理了。前美國砲兵供應部長耿培爾，已成為「國際收穫機公司」的副經理了。如不嫌煩的話，這張名單還可以寫下去。

還有一種現象也很值得注意：如「美國軍團」、「哥倫比亞武士團」之類的極端反動組織，在全國各地大大加強它們的活動了。去年秋天，這些組織會在美國召開大會。最著名的反動份子，在會議上大談其反共「十字」進軍。

報紙上還透露，成立了如喬治亞州的「哥倫比亞人」之類的公開的法西斯組織，這并不是偶然的。這裏不能不把另一條消息拿來和它對照，這條消息說：紐約州長杜威組織了「應付新戰爭的志願兵團」。奉命任該團團長的休德羅將軍，會公開誇口稱：「志願兵」將受訓練，以「鎮壓國內的動亂」

人 民 要 生 存

「大商業」所採用的這一措施，由於戰後美國社會糾紛的不斷擴大，而使人明白其意義了。物質生活條件的劇烈惡化，榨取的加強，反動的加強，已喚醒美國工人們奮起爲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戰後全世界的報章雜誌，又刊載了許多美國的罷工消息，這不是偶然的。在一九四五年，此地曾發生了四六一六次罷工，參加人數約有三四百萬人。在一九四六年，美國有三二〇〇次罷工，七百萬入參加。這個數字遠超過一九一九年的罷工次數，而打破了美國罷工史中的紀錄。一九四七年，罷工運動也沒有平靜下來。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僅在一九四七年的九個月內，便發生過三千次「停工」，因而損失了二千九百六十萬工時……參加罷工的人，一致要求提高工資，減少獨佔資本的利潤。

一九四六年底，「羅伯·納頓經濟研究所」^①遵照產業職工大會的請求，做了一個研究報告，這報告指出，如果獨佔資本的利潤能減至一九三九年的水準，那麼靠了這筆款項，便可以製成工業的工資立刻提高百分之二十一，其餘各部門則可以提高百分之二十五。但獨佔資本的首腦們，對於這種

① 羅伯·納頓 (Robert, R. Nathan) 是著名美國經濟學家，曾任美國動員復員局副局長——原註。

分配收入的方法，連聽也不願聽。例如，汽車康采恩「通用汽車公司」的經理威爾遜說：

「當工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時，汽車價格也立刻要提高百分之二十五。」

據美國經濟基金委員會統計，僅僅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九月，美國工人因罷工而損失的工資就達九億九千八百萬美元。單是煤礦工人就損失二億二千二百五十萬元。在「寰球航空公司」(T·W·A)飛機師罷工的時候，我帶着從未有過的驚奇，在百老匯看見一個穿着整齊制服的駕駛員，胸前掛着標語：「駕駛員罷工。我是退伍軍人，腰無分文。請諸位援助！」人們施捨他幾個錢，瞧也不瞧地走了。儘管罷工的職工遭遇着巨大的困難，他們仍繼續頑強地鬥爭。

如果美國的職工運動更有組織，更能團結，這鬥爭會更加順利的。事實說明，領導美國職工運動的，到現在為止，仍是那些願意和資本家勾結的人，這些人大都是獨佔資本的直接特務，是為他們主子的利益而活動的。

一九四六年秋天，當我們住在美國的時候，這裏曾發生震動全國的、如火如荼的煤礦工人大罷工。這次罷工的經過情形是很有意思的，值得在此講一講。大家都知道，美國礦工們十年以來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反對煤業獨佔資本的壓迫，他們進行了頑強的、不顧一切的鬥爭。美國礦工們的可怕處境，艾普頓·辛克萊已在二十年代出版的長篇小說「石炭王」中，有力地顯示出來了。從那時起，美

國的礦井一直沒有什麼改變。和從前一樣，煤礦工人現在仍受着殘酷的剝削，和從前一樣，他們不得不住屬於煤礦公司所有的破草房，不得不在屬於公司的商店中購買用品，這豈不得不為這一切付出高價；和從前一樣，安全設備的起碼要求，都被資方拒絕了。據美國統計資料，十五年來，礦井中因機械損壞致死的達四三、二七三人，喪生的有七七〇、九九一人。

向 人 民 宣 戰

在戰爭時期，礦工們日夜不停地工作。除開他們的額外工資以外，僅加了很少的工資，但飛漲的物價，却使這些工資等於沒有加。戰爭結束之後，礦工們重新為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為礦井的基本安全條件而鬥爭，那是很自然的。煤礦公司的老闆們，對於現狀的任何改變，都斷然地反對。

礦工職工會與煤礦公司之間的談判，拖延了好幾月，而最後仍無結果。當時，礦工們便決定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罷工。這次罷工差不多繼續了兩個月。最後是由政府派兵駐礦，將礦井的管理權交給陸海軍官，由自己來管制煤礦工業而告結束的。礦工職工會與政府之間締結了一個臨時的折衷協定，才恢復了工作。大家以為礦工職工會與煤礦公司之間將恢復談判，以達成肯定的結果。然而並不如此。

於是到十一月，礦工們又罷工了。這次，政府對這些倨傲不馴的煤礦工人們，決定採取更殘酷的

措施。法庭不顧現有法律，竟下令禁止罷工。這項決定激怒了美國各階層的廣大社會人士：因為大家對於職工會為取消法院干涉勞工糾紛而進行的長期和頑強的鬥爭，是記憶猶新的。在故羅斯福總統執政的三十年代，這鬥爭有了很大的成就：當時會通過一項法令，禁止運用法院來防止或取締罷工。而最近這次，政府却使用了一九二二年用以防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方法。所以現在是政府公開破壞法律。

法院的禁令，並沒有禁止住煤礦工人，他們仍然拋開了工作。在賓夕法尼亞、伊利諾斯、阿拉巴馬、康達基、俄亥俄、浮琴尼亞、印第安那各州的礦井，全是靜悄悄的。鐵路的行車立刻減少；去紐約的列車數量，一晝夜便減少了五百輛。紐約州宣佈了戒嚴。遵照華盛頓的命令，美國東部廿一州實行了部份燈火管制。商店的玻璃櫺窗和廣告，以及調節空氣的設備都禁用電力。電梯的電力消耗，也指定要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平時燈光輝煌的百老匯，在這些日子裏也顯得陰森森的了。好像城中放了空襲警報一樣，到處是漆黑一片。

知道內幕的人們說，採取這些臨時措施，並不是由於實際的需要。當局所以如此做，是想引起市民們的反感，使他們怨恨煤礦工人，想恫嚇普通美國人，強迫他們相信，這一切災禍的過錯都在礦工身上。報章雜誌無情地打擊煤礦工人。資產階級的書報利用煤礦工業中的糾紛，以擴大攻擊美國工人

階級在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所爭得的權利與自由。「華爾街新聞」、「紐約時報」、「紐約先鋒論壇報」，都一致奉命在社論中指責「新政」，說它「噴發出許多不講理的煤礦工人」。反動報紙要求馬上重審及取締保衛職工會權利的法案。

反動參議員白爾德要求國會召開緊急會議，制定以破壞礦工罷工爲目的的反勞工法案。「紐約先鋒論壇報」重複着他的話說，現在是制定此項法案的最有利的時機：「政府在三十年來，第一次準備對工運宣戰。共和黨員佔大多數的新國會，也準備在這件事上支持政府。現在一定要結束「新政」了。」該報根據這些「有利條件」，於是提出一個完整的計劃：應當重審「華格納法案」（這個法案規定了職工會的權利）；各種反托辣斯法案及反欺詐的法案應該也適用於職工會爲非法團體。這也正是「華爾街新聞」所提出的任務。它寫道：「憤怒的國會能够把一切美國職工會壓成粉碎。」

州官可以放火

在如此緊張的情勢下，十一月廿七日，華盛頓聯邦法院的一個小庭上，開始審理礦工職工會被控……不敬法院的案件了。所謂「不敬」，這意思就是，雖然法院下令禁止罷工，而礦工們仍然罷了工。法庭中擠滿了各報記者和聽衆。法官霍茨波洛明白控告的理由不够充分，自覺到不能使人完全信

服。剛開庭的時候，他口吃地說，他想邀請陪審官來，並賦予他們判罪或開釋礦工職工會的全權。在這非常的案件中代表政府，以原告身份出庭的美國副總檢察官打斷了他的話。他說：

「政府認為，礦工職工會無權以正常的陪審法庭來審理它的案件。」

辯護律師反駁道，此案根本不能構成罪行，因為以諾里斯—拉加蒂亞為名的著名法案，是禁止法院干涉勞工糾紛的。

「我從政府的文件中得到一個印象，認為這個法案所標榜的政策，對於一切人以及每一個人都有遵守的義務，不過對於政府是例外，」辯護士以辛辣的諷刺口吻說道，「然而這法案對於政府不能有例外。承認有這樣的例外，便是歪曲法律。」

傾聽辯護律師講話的法官，突然提醒說：

「在通過諾里斯—拉加蒂亞法案時，我是國會的議員……。」

「不錯，我知道，」——辯護律師針對這一點抗辯道：「我認為，您是贊同這個法案的。」法官肯定地點了點頭。但這並不妨礙他說，照他的意思，礦工職工會還是犯了不敬法院的罪。

「我不願任何人對於此點有所懷疑。個人不能以自己的看法來解釋法律，以及決定如何處理它。這是無政府主義！」法官非常莊重地說。

於是他判處礦工職工會三百五十萬元罰金……

這個非常不公平和不合法的判決，引起了新的憤怒浪潮。全國律師公會聲明，法院禁止礦工罷工，是非法的。汽車工業工人及電力工人職工會都發表聲明說，他們準備給罷工工人以一切援助。海員職工會、鐵路員兄弟會、煉礦工人職工會，以及其餘許多團體，都發出了同樣的聲明。產業職工大會，致函美國勞工聯合會及鐵路員職工會，號召他們為美國工人階級的利益，建立統一戰綫。

這樣，情況已變得對發展礦工們的鬥爭有利了：全美國的工人階級，都準備支持他們。但在這個鬥爭的頂點時刻，礦工職工會的領導份子突然宣佈……停止罷工。進步輿論猛烈斥責這個意外的決定。許多報紙報導了煤礦工人的矛盾情緒：一部份礦工高興能够復工，而另一部份則不置，為什麼停了十七天工，現在沒有得到任何重要結果，就一下子命令復工。

而反動派是欣喜不止了。大托辣斯爲了礦工們沒有多拿一文工資而復工，大事慶賀。他們要求對工人進一步加強「嚴竣的政策」。議會裏的代表們，不斷地把一個比一個更狂妄無理的，以鎮壓僱傭不馴的職工會爲目的的反勞工作案，送進參議院。

雖然如此，可是美國的職工們爲了自己的權利與利益，依然頑強地鬥爭。跟隨在礦工之後，煉鋼工人、汽車工人、紡織工人、電話工人、電報員、碼頭工人、造船工人，也一致要求提高工資。一九

四七年四月，美國的電話工人展開了罷工，各城市間的聯繫陷於麻痺了。當一座礦井裏發生了慘死一百餘工人的災禍之後，礦工們又立刻拋開了工作，對那不能滿意的技術安全條件，表示抗議。這次鬥爭的性質日益尖銳起來，因為美國的反動派日益橫蠻無理，日益頑固地一心一意要鎮壓工人運動，摧毀民主組織，變勞動者為無權的奴隸。

○ 一九四七年七月，礦工們為提高工資而進行的長期鬥爭，終於勝利結束。結果礦工工會與礦廠老板，雙方訂立了一個集體條約，根據該約，礦工們的工資每天提高了一元二角。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礦井老板同時將煤價每噸提高了一元。煤價上漲又引起物價普遍上漲，結果煤礦工人在這種長期而頑強的鬥爭中所得到的一點工資，等於沒有加。——原註。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產業職工大會宣佈戰後第三次提高工資的鬥爭原則。此項原則是要重新簽訂一九四八年的集體條約。美國工業協會對職工會的這個號召，答以狂妄無理的建議：「為要阻止通貨膨脹，職工會至少應在一年以內，放棄提高工資的要求。」但職工會拒絕了這個建議，加強準備新的鬥爭，同時他們要求，應犧牲資本家的非法暴利，以提高工資。剛結了二十萬人的五個海員職工會，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發表聲明，正式要求造船工業家提高工資百分之十五至廿五。石油工業職工會要求提高工資百分之十二。「西聯電信公司」的電報員們罷了工，結果每小時工資提高百分之十五。電氣工業職工會、橡皮工業以及其他部門的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資的要求。——原註。

三 被收買的筆

寫文章和賣啤酒一樣

一九二六年馬雅柯夫斯基寫道，「普通美國人的世界觀」是根據報紙構成的。從那時候起哈得遜的河水又不知流過了多少，普通美國人的信仰也有了些變動，他們已學會用更批判的眼光，去看美國出版的一萬二千八百零四種報紙和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七種期刊所帶給他們的精神食糧了。但如果我們對那些表面上是花花綠綠、各色各樣、而實際內容却單調得令人生厭的大批美國報紙所幹的製造輿論的工作加以輕視，那也是一種錯誤。

關於美國的資本主義出版物，關於它們的氣質和態度已經寫了不少有趣的書。但要全面地勾出它們的面貌，必需更進一步去認識它，在活動中觀察它。

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巴黎和會上，我第一次得以廣泛觀察美國記者們的工作，因為那裏有二百八十

五名特別由美國派來的新聞記者。他們大多數人工作的專門性質，一下子便映入了你的眼簾。他們動作迅速、明確、有條理，但帶點機械性，像在傳送機旁邊工作一樣。和工廠中差不多，工作是按各種因素而明確劃分的：一批人擔任會場工作及筆記，另一批人則把這些筆記改爲詳細的報導，第三批人再譯爲電碼以電話或電報發出去。空閒時候，他們說下茄克，掛在椅背上，就在電話室和電報機旁，在幾十部打字機不斷的叫囂下，玩起撲克牌來。

「任何工作，都是生意，」一位美國記者對我說：「寫文章，賣啤酒，或者造房子，不都是一樣？都可賺大錢。人家說我們的報紙反動；我的老闆與紡織業有利害關係，因此這就決定了報紙的路綫。但這關我什麼事？」

這位記者對他自己的薪金，頗表滿意。他只埋怨老闆派他到歐洲太久，他過去是戰地記者，而現在他轉到報導外交會議的工作上來。

所謂「協助製定政策」的比較狹窄的外交觀察家的圈子，是過着另外一種生活的。他們根本不去會場，他們對那裏所發生的事，也沒有什麼興趣；他們經常出沒之處，是休息室與酒吧；因爲那裏可以向熟悉的官員挖一點重要消息，探聽一點美國代表團的情況，以便根據這些來做他們的文章。但這種特殊的貴族記者，也具有一種與卑微渺小的訪員有血緣關係的特性——爲主子工作和照主子的命令

工作。

獨佔資本的喉舌

在巴黎和會上，有一位美國最著名的觀察家，他在戰時曾任駐蘇聯戰地記者。那幾年，他曾客觀地報導了我國的生活，甚至還出版了一本關於紅軍的不算壞的書，那時候，像這樣的書，是美國出版家所需要的。這位觀察家現在還常常談起他自己對蘇聯的友誼，可是這並不妨礙他在自己的每日展望中，不斷誹謗及歪曲蘇聯代表團的態度。這種偏見的報導，是符合報紙的總路綫的，於是觀察家就違背了良心。

但現在我們到美國了。那些在巴黎聽起來祇是遙遠的餘音，而現在却立刻使人吃驚，使人耳聾眼花了……

美國的報紙是日夜出版的。統計起來，在美國每三十秒鐘便有一張新的報紙出版。白天和夜晚的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在書報攤上買到一份精緻的、油墨未乾的報紙。它的篇幅由二十四頁至一百頁。

在美國，人們稱出版是「製造輿論的企業」。應當指出，在這裏人們是以純粹企業的方式來辦出版事業的。在美國的新聞事業中，投有大量的資本，所以支配這事業的托辣斯，是真正左右一切的大

權威。

形式上說來，美國是有出版自由的。但，正如美國人所說，如果銀行裏沒有一千萬，或一千五百萬，誰也不要想出一張報。

獨佔資本的體系，把美國的新聞事業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一位美國記者喬治·麥里昂在「自由出版」一書中所指出，在廿五個大城市裏，全部報紙僅屬於三個老闆。赫斯特、霍華德及柏德遜——麥考米克的反動報業，在美國起着重砲的作用，以偏袒的造謠消息，來轟擊無助的讀者。屬於這幾個集團的報紙的總發行額，早在一九四四年，每天便達九、六四九、一〇八份，而每星期日達一三、五七八、六八七份，約為全部日報及週報發行額的四分之一。這裏還應當加上那些形式上不屬於上述幾家托辣斯，而却經常採用及發表赫斯特的「國際新聞社」消息的各報。以偏袒的、極端反動的消息來毒害讀者意識的報紙的真正發行額，達二千二百萬份！

這就是美國新聞事業的不堪入目的幕後景象，這就是那架複雜而龐大的輿論製造機的真面目。但是，我們再回頭來看看那普通的報攤，攤子旁邊站着一位很客氣的報販，他絕未想到他在這架機器中担当什麼角色，以及他所出售的是多麼惡毒的貨物。我們回到這個報攤上來，仔細看看它那五花十色的貨物……

「不讓他們聽到真理」

你面前是擁有大羣讀者，插圖很多的半雜誌型的出版物，份量達七十頁。這是最便宜的報紙，每份只賣兩分錢。什麼「每日鏡報」或「每日新聞」之類，頭條是印着特號字和當天最動人聽聞的照片；司空見慣的被擊斃的匪徒屍體、燃燒的飛機、剛被逮捕的暴徒或兇手的像片，佔滿了整個第一版。正是這種報紙，才有大量的發行額。例如「每日新聞」，每天要印兩百萬份，而星期日它的印數達四百萬份。

標題刺着你的眼。花兩分錢你便可以盡量享受在一小時前發生的一切兇殺案、慘劇、騙案、婚禮、高等舞會的最詳盡的敘述。

「美國史上最可怕的飯店大火！『大西洋飯店』活活燒死一二五人！」——同時還有一張用望遠鏡頭拍的照片：一個女人，穿着火的十四層樓，墜到馬路上。

「加拿大第一批因規案而判死刑的女子，在托倫多絞斃！」——又是一張照片。

如果把這些報紙一份一份地看完，人們不禁要想，在美國，除了兇殺、慘劇、轟動一時的大案件，以及死刑之外，就沒有什麼事發生了，——它們的版面，的確是給技術高明的照片——打壞的汽

車、人的屍體、打架的照片弄得五花八色。這些照片愈可怕、愈叫人討厭。美國人便認爲這份報紙愈成功，——因爲它必需使讀者茫然，使讀者吃驚。

至於這種黃色新聞的洪流將戕害讀者的心理，特別是年輕的讀者，及刺激犯罪的增加，那是不用說的。如果有人敢於高聲反對這種報紙的性質，那他立刻就會被控以破壞臭名昭著的「美國言論自由」之罪。

於是，黃色新聞便高於一切了。可是爲什麼這些黃色報紙，會如此熱心地在城市的渣滓中兜圈子？爲什麼他們這麼熱切地把罪行和醜事加以最詳細的描寫呢？這並不是那些黃色新聞本身使出版家感到興趣，而是他們在追求着一定的、毫不含糊的政治目的。早在四十年前，高爾基就在他的美國印象記中，很清楚地把這點指了出來，他說：這種叫囂「淹沒了社會的一切聲音，不讓它聽到真理」。

「如果拋許多小木片在河裏，那麼你的眼睛就不會去注意它們當中飄浮着的大木塊，」高爾基的美國印象記中的一位主人翁說道：「或者，如果你滿不在乎地，把你隣人口袋裏的皮夾掏了出來，立刻再把大家的注意力轉到那偷一把落花生的小孩身上，那麼你就可以免掉丟醜了。只要你高聲喊「有賊！」……大偷就被小偷隱瞞過去，總之一切大罪便給許多小事物沖得煙消雲散……永遠處於催眠狀態中的人民，他們就沒有時候去獨立思考，他們就只好聽報紙的話了。報紙是屬於百萬富翁的……你

懂嗎？……」

至於重大政治事件，那麼，這種黃色報紙便以最不可解的、而且是極端歪曲的方式，報導給他們的讀者。它從不直接說出發生了什麼事，而總是蒐集了有關這事件的一切傳聞和流言，把它們一股腦兒登在報上。從這些報紙的政論中遠遠傳開了最怪誕、最放肆的謊話、無知、及無恥。正是在這裏，活躍着被羅斯福斥為「週期撒謊者」的聲名狼藉的德留。皮爾遜之流的報痞子。在「每日鏡報」上，皮爾遜每天在同一惡毒的標題下——「華盛頓木馬」，刊登出他的菜單來。

所謂「大報」，看起來是莊重些了。「華盛頓郵報」、「紐約先驅論壇報」、「紐約時報」的讀者圈子比較狹些：參議員、工廠老闆、律師、新聞記者在吃早飯的時候翻翻它們。它們的發行額計二十萬——四十萬——六十萬份。這些報紙的任務更微妙些、更精細些：在它們密密排列着小鉛字的巨大篇幅上，產生了美國的政策。雖然它們對於馬路新聞，也常常分出大量的篇幅，——在六十頁的地位上是不在乎的！——但這些報紙所觸及的問題，廣泛得多，它們的論文也比較冗長和複雜。

美國各「大」報的工作人員，以他們的消息靈通而自傲。他們不放過任何一件稍為顯著的事件，如果編輯部認為把這件事在報上刊登出來是有利的話，出版家便不惜花費幾百萬元去裝備他們的印刷廠及專用通訊工具。他們租用直講電話，設置無線電台。報紙的編輯部擁有大量的通訊器具。這裏，

幾十部電報打字機不停地響着；自動把全世界報告員所報告的東西，記在紙帶上的電報機，日夜不停地搜索着「從南極到北極」的太空；自動機記載着記者們從千里外用電話打來的文章；無線電傳影機，攝取着海外用無線電播送出來的照片。

「紐約時報」

我們參觀過「紐約時報」的編輯部和印刷部，這是美國資本主義報業的主要報紙之一。「紐約時報」的工作人員喜歡向人誇耀說，就消息內容及分佈國外的通訊網而論，美國任何其他報紙都比不上紐約的「時報」。

的確，篇幅很多的「紐約時報」，搜羅着大量形形色色的消息。但這張報紙却常常以「消息」為幌子，而將不成其為消息的東西，說正確些，即把所謂謊言及誹謗送給它的讀者。消息的形式祇是一種特殊的偽裝。

大家都知道，從蘇維埃政權建立時起，「紐約時報」就採取着激頭激尾的反蘇立場。在內戰那幾年，這張報會六次向讀者報導說，彼得格勒投降了，三次說她已處於投降前夜，兩次說她焚毀殆盡，兩次說那裏混亂不堪，又六次說彼得格勒發生了反布爾雪維克的叛變。蘇聯政府因這些虛妄的宣傳，

而不得不請「紐約時報」的記者離開俄境。

大家都都知道，「紐約時報」對於內政問題，在過去十年間一直採取着澈底的反勞工路線。在它的篇幅上，曾一再出現非常狂妄的給企業家的忠告，例如：「少數人的失業，是避免許多社會不幸事件的良藥。當理智與生產紀律不起作用的時候，就得向肚皮去上訴。」

最後，也是大家所知道的，許多年來「紐約時報」努力不懈地挑撥着種族仇恨。正如美國記者們所說，阿瑟·蘇茨貝格爾^①的前輩阿道爾夫·奧克斯，在一八九六年取得「紐約時報」的時候，情形是很可憐的，總共發行一八、九〇〇份，但到一九三五年，它已成爲美國的主要報紙之一，而每年有了兩千萬元的總收入，——這位事業家「不能避免他從查丹奴加^②帶到北方來的恐黑（黑人）症」。

他的繼承人阿瑟·蘇茨貝格爾做出一副姿態，彷彿「紐約時報」現在是「沒有偏向的」，它「從最廣泛的立場去研究許多問題」，「更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及「不願譴議「赤色份子」了」。但在報業中，正如在其他事業中一樣，不能憑他們的話去判斷人，而要看他們的行動；不能看廣告，而要看事實。而事實却是這樣的：在對內政策問題及國內生活的問題上，「紐約時報」總是站在極右翼的

① 現在的「紐約時報」老闆。

② Chattanooga 美國南部田納西州的一個小城。

立場上。我們在紐約的時候目睹了這個事實，我們每天觀察着重大的事件，並且看到「紐約時報」如何報導它們……。

因此，我們便去造訪了一家輿論製造廠，它幾十年來幫着美國統治集團製造了他們所需要的輿論。

「紐約時報」巡禮

我們知道，「紐約時報」的老闆們對於改進這個製造廠的技術，是不惜重金的。據說，「紐約時報」這個企業，現在實際上是無法估計其價值的：沒有一位百萬富翁有這麼多的錢能買下這家報館。認識這樣的有組織的，配備着最新技術的企業，是很有意義和很有趣的……

高而細的、像刀子一樣的「紐約時報」的三角摩天大廈，屹立在曼哈頓最中心區的「時報廣場」上。左右兩面是百老匯和第七街，那裏有密集着的高樓大廈，緊排着的巨幅廣告，點着幾千盞通明的燈光，閃爍得叫人眼花撩亂；在這狹窄的石頭峽谷的底部，是一條無盡頭的汽車的洪流。在「紐約時報」大廈第六層樓上，攔腰圍着一條電動新聞帶。沿着大樓的三個門面，日夜不停地跳動着報章最後新聞的電動字母。但報紙並不在此地編印，佔有這個大樓的，只是管理該報廣告的附屬機構。

「紐約時報」的編輯部和印刷部，却在附近一條靜悄悄的陋巷裏的另外一座大樓內。

通過低矮陰森、光綫很暗的過道，我們乘上電梯，來到了一間官派十足的空洞的大廳，它使人感到一種工廠的氣味。大廳就是「紐約時報」的整個編輯部。這種情景簡直使人覺得，我們眼前不是那創造性的、栩栩如生的社會思想的發源地，而是一種特殊的企業——奉命在此地製造並立刻拋到市場上去的罐頭思想的工廠。

從隔壁一間屋子裏，傳來正收着世界各國新聞的收報打字機的響聲；匆匆忙忙的訪員剛剛坐下來，打字機就劈劈地叫起來了。無綫電攝影師、洗印照片的人們，都緊張地工作着。各部份的主持人，像是工場中的技師一樣，在桌子之間急急忙忙地穿來穿去。

這裏所進行的全部生產過程，好像任何一家大量生產的美國工廠中的傳送機一樣。經過編輯部這架傳送機加工之後的成品，便是這家商店——「紐約時報」商店——的貨物了。

編輯部時而由電報、時而由電話、時而由無綫電、時而直接從個別獲得消息的記者們手中不斷得來的消息，都分配給各部門，這些部門有金融、商業、本市、市郊、國內、國外、體育、社會、殘儀、娛樂等等。這些「原料」只在這裏經過最初審查。不合「紐約時報」胃口的消息，便丟進字紙簍；有利於「紐約時報」及它代表其利益的人們的消息，就在這裏加工而成爲「半製成品」。過十五

——廿分鐘以後，這條消息又交給另一個傳送機——它再把它送到房間角落裏的一個巨大的馬蹄形桌子上，這張桌子周圍坐着六十四個人。這裏是編輯部的主要工作地。桌子中央和兩旁，坐着三位新聞編輯；其中第一位，處理有關國內生活的新聞；第二位，處理報道本市生活的新聞；第三位，則處理國外生活的新聞。這幾位編輯的旁邊，是他們的助手——經驗豐富、顯得很瞭解他們上司脾氣的報界老狐狸。

美國各報的新聞稿子，做得非常特別。它們的主要內容先由好幾行標題加以說明。然後，以大字體排出來的第一段消息，把新聞內容報導得較詳細些。而以稍小的字體排出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就更詳細些。最後，以小鉛字排出來的各段消息，則包含了一切細節。讀者看自己的時間和願望，或者讀遍全部消息，或者看第一段，或者只用眼睛瞟一瞟標題。

坐在馬蹄形大桌子旁的新聞編輯及其助手們的責任，就是把這一整報料，做成適合胃口而能賣給讀者的形式。他們應當在一定的短時間內，製作編輯部所得的材料，編成第一段，再給消息配上引人注意的標題。

但新聞編輯及其助手們的任務，決不限於把他們手中所得的材料施以技術上的加工。他們的職權非常微妙而且複雜。那種經常把消息變為非消息的文字修飾，正是在這裏進行的。由於猜測得出的某

種原因，我們不可能參觀這個微妙的行動過程，雖然每天從版面上讀着的，完全不是我們週圍所見和所聽的東西。

可是這裏却有一位「紐約時報」發行人及編輯們的同胞，過去也是發行人的維拉爾德的公正證明。在他的「受損害的報紙」一書中，他直接舉出一項事實，說從前「紐約時報」特派記者赫伯特·馬休斯的一條消息，給「編輯」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在西班牙內戰時，赫伯特·馬休斯從那裏發來一條消息說，佛朗哥在干涉者們的刺刀上，穩保了江山。當講到發動攻勢的法西斯部隊時，馬休斯寫道：「這是義大利的軍隊」。但報上並不見這幾句話。而代替它們刊登出來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東西：「這是叛軍，僅僅是叛軍……」

維拉爾德又說，這樁醜事，是由「紐約時報」的同人們當時非法出版的、經常揭穿編輯部諸如此類之祕密的「好時報」(Better Times)拆穿的。

編輯和他們的助手們，背也不挺一下地緊張工作着。在他們的桌子上面，裝置着帶有小簍筐的溜索傳送機，完全像在汽車工場中一樣，從這架車床通到那架車床。這些簍筐中放着原稿，而傳送機則將它們送到排字房去……

同時，在兩層樓的上面，在幾間清靜舒適的小寫字間裏，編輯着相當於歐洲報紙的社論的論文。

美國報紙的這些論文，登在消息背面一版的各欄中。它們的任務，是將當前的事件，做一種合於該報所定的政治路線的解釋。「紐約時報」的這個主要部門，由十六位政治編輯負責，而以美國著名政論家霍利·麥爾茲為首。報紙的篇幅上，沒有他們的名字，社論是無須署名的。然而，正是這個無名的臭法庭，在編輯部起着決定作用，正是他在決定報紙的論調。

政治編輯於上午十一時開始工作。他們每天在一間不大的會議廳中，召開一次會議，這個會議廳的一面牆壁上，有幅巨大的世界政治地圖。這幅地圖上面，標誌出「紐約時報」分佈於全球的一切事務所和通訊站。在歐洲，「紐約時報」有五十名記者，在東京、哈爾濱、上海、新加坡、開普敦、開羅、布艾諾斯艾利斯、巴拿馬、蒙里亞爾、渥太華，以及其餘許多城市，都有它的事務所。

開會的時候，該報老闆阿瑟·蘇茨貝格爾是經常參加的。此外，也邀請國外新聞部負責人傑姆斯參加。他必須通曉編輯部的政策，以便用適宜的方式指示記者，並編輯他們所得來的消息。編輯部的其餘工作人員，包括各負責人在內，則不得參加這些巨頭們的會議。

當這個會議決定了當天報紙社論的主題以後，編輯們就回到各人的辦公室裏，開始工作。

緊張的編報時間開始了。下午五點三十分，晚班第二副編輯到了編輯部。他看過各通訊社送來的消息，及各部門對特派記者的最重要消息所作的簡略摘要之後，他再看各部門負責人送來的通知書。

在我們訪問「紐約時報」編輯部那天，金融部要求廿九欄的地位，國外和本市部——廿八欄，體育部——十八欄，礦儀部——五欄，娛樂部——也是五欄等等。所有各部，共需四九〇欄。

過了一小時，夜班編輯——個子不高，復結實，有一副紅紅的笑臉，白髮的人——來了。麥克·考先生自一九〇七年起就幹新聞工作，一直在「紐約時報」作了廿四年的夜班編輯。他在午後六時卅分上班，夜裏兩點正回家。

麥克·考聽了他第二副編輯的報告之後，他再很快地翻閱各部門的摘要和通知，然後拿起自來水筆，劃出它們重要的地方。這天晚上，他把國外部的通知減縮為三欄，本市、金融、及礦儀部減縮為一欄。當這份報紙的內容大致決定了時，麥克·考便跟副編輯坐下來編排欄數，決定甚麼材料應登顯著地位，甚麼放在不顯著的地方，甚麼樣的題目做頭條，那些消息應該用明天足以引起讀者注意的大標題刊登。

這天晚上沒有驚人消息，麥克·考把第一版編成了勻稱的版面，使各條消息可以平等地並列在一起。他把兩條消息登得比較顯著些：一條是安全理事會建議派遣巴爾幹調查團；另一條是著名足球隊的醜事：芝加哥隊的球員貪污被檢舉。在同一頁，他又發了一些消息：杜威不願競選總統；拉加第亞——賽爾德飛機場急需重建；杜魯門預測一九四七年將有美麗的前途，如果……大家有工作；在哈爾

列蒙薩獲一家匪黨的製毒公司；參議員巴爾波不承認自己犯貪污罪等等。

當第一版的計劃已經決定，並將版樣交給印刷組的時候，麥克·考便和他的副編輯去編次一版，將各部門材料編入廣告剩下來地方。大家知道的，美國報紙中的廣告差不多佔有報紙篇幅的一半，並且對消息來說，它是有優先權的。它們印得比較早，同時廣告部與編輯部也完全沒有關係。甚至排廣告的印刷工人也屬於另外的職工會，而不是排消息的。夜班編輯必須接受廣告部的版樣，其中詳細畫着這份報紙的廣告地位，並且必須以適當方式將自己的材料彎彎曲曲地填滿空檔。

最後，這份報紙所有五十二版的版樣，都一個接着一個地送到印刷廠裏去了。那兒，在下面，正進行着熱烈的工作。老練的排字工人和拼版工人以一定的步驟工作——晚上七點鐘開始排報，到十點十五分的時候，就得印出第一張報了。作為排字和拼版工人軍的「統帥」的，是晚班第一副編輯麥克·尼爾，高個子、寬肩膀、老成持重的洋客，編輯部叫他做「牛筆」(Bull Pen)。他那枝不講情面的筆，把那些版樣裏排不進的消息，加以無情地刪節。這也是一位報業老狐狸：幹了廿九年的夜工。麥克·尼爾每夜九時上班，一直工作到次晨四點鐘，就是拼完最後一版的時候。

「紐約時報」的印刷廠，配備着最完善的印刷技術——在技術方面，出版者是不惜重金的。由於劇烈的競爭，一份報紙比別家出版得早，是非常重要的。從拼版到打紙型，共計廿分鐘，從打紙型到

開始印，不過十四分鐘。強大的製版工場，每天可製四五千塊銅鋅版。捲筒機同時能印八十頁報紙。

自然，在這麼匆忙的情況下，編輯部不僅對於編輯新聞的工作不能付予必要的注意，而且在校對方面也一樣。校對者只看毛坯——只看一次——之後就檢查改稿了。無論是編輯，無論是各部門負責人，無論是晚班編輯，及其副編輯，都不看報紙的整個版面，要做這事，時間是不夠的。在這種情況下，報紙上便會常常碰到重大的錯誤，標題弄錯，行列排錯等等。對於這一切，這裏是熟視無睹的，——只希望報紙出得快，只希望它能比競爭者的報紙更早地送到報販手中！……

編輯部所關心的主要事情，便是不放過任何重大事件，並把它們報導成該報老闆所要求的那種樣子。同時，對於許多事件，大用其報紙的特殊「否決權」，而對於另外許多事件，則整個報界都遵守默契，閉口不談。

偏袒和「人咬狗」

講到美國報紙驚人的偏袒和不公正時，維拉爾德在他的書中寫道：「有時讀者無法理解，明明看見一羣記者參加了集會，但過後在報紙上却找不到一句關於這件事的記載。最多祇能看到寥寥幾行。」

參加聯合國大會那幾天，當我們看到了美國報紙的報導時，一再使我們想起了這些話。一般說來，對於這方面的報導，報紙是不惜篇幅的。譬如，我們能從美國報紙上知道：昨天參議員康納利打什麼領帶，英國代表蕭克洛克斯帶着什麼扣花，參議員奧斯丁怎樣笑。我們可以讀到許多在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上發表的演說全文。然而——真是怪事！——在許多場合，這部報業機器彷彿不願理睬似的，中斷下來，不管我們一份一份地翻來翻去，始終找不到大會中心人物的演說……

特別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蘇聯外次維辛斯基發表一篇輝煌的演說，論及英美佔領區中難民營的實際狀況的時候。維辛斯基舉出大量實際材料，指出這些難民營已變為罪犯的避難所；法西斯的軍事組織都化裝為難民混在裏面；難民營中佔支配地位的罪犯，對於希望回返祖國的真正難民，施以虐待和恫嚇。

當發表這篇演說的時候，記者席上是一片非凡的活躍。所有的記者們，都竭力記下維辛斯基所列舉的準確的驚人事實。他們的助手拿着記錄稿，不斷跑到電話機旁，將大會進行的材料轉達給編輯部。但是……當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翻開印着昨天日期的各份大報，却找不到這忙翻了天的記者活動的絲毫蹤影。「紐約先驅論壇報」在它六十四頁的篇幅上面，只分了三十行地位給維辛斯基的演說；而「紐約時報」編輯部把問題解決得更別緻：在第一版上，它登了一條關於這篇演說的短消

息，而以後幾天的報上則以測量印度洋深度的消息……代替了它。相反的，那些竭力爲難民收容所的現狀而辯護、而洗刷的人們的演說，則在所有的報紙上普遍刊登，並且是說得很動聽。

這種偏袒的作風，就是美國新聞事業的作風。

許多報紙的第一版上，大量登載着關於蘇維埃國家及其人物，關於東歐各國局勢的最無禮、最荒誕、最可怪的惡意描寫。只要其中引有蘇聯城市的名字，或蘇聯人物的姓氏，任何骯髒的謊言，都會被美國反動報紙抓來利用的。

在美國，人們喜歡說美國報紙的獨立性，據說它們刊載的東西，只是它們的編輯和工作人員們所想到的。但每一個讀者觸目所見的，則是大多數美國報紙都將那經常以同樣的標準形式包裝起來的同樣的想法，塞給它們的讀者。在巴黎和會期間，以及後來聯合國大會期間，甚至毫無經驗的讀者都看得出，全美國的報章雜誌上，像浪潮一般洶湧着千篇一律的無中生有的寓言，即所謂「斯拉夫集團」、「俄國人的強硬政策」、「赤色威脅」等等。所有這一切議論都散發着造謠的氣息。蘇聯外交所得的勝利愈大，反蘇浪潮也掀得愈高，這是值得注意的。而討論德國問題的外長會議前夕，美國報章雜誌上的反蘇運動甚至就美國來說，也到了非同凡響的規模，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當你同美國記者談起這一切暴露美國報章雜誌的醜態的事情時，他們就設法以戲言來答覆。

「你們很難瞭解我們的特殊情況，」一位記者在大會的過道上對我說：「對於我們的報紙，主要的就是聾人聽聞，稀奇古怪，不同凡響。我們這兒有句老話：『報上消息，就是人咬狗。』你懂嗎，如果是狗咬人，這就一點也不意外、不非凡、不聾人聽聞了。如果現在你寫出人咬狗來，那就可以登一登了！……」

「可是你們想不到，在這樣的工作方法之下，報紙豈不成了四脚動物，而開始做狗叫嗎？」。我底鄰人，一位南斯拉夫的記者插嘴說：「并且你們也不以為，讀者爲了害怕咬着自已，終於會避開這樣的報紙嗎？」

我們底談者慫慫地微笑了……接着就馬上改變話題。

「真理終會聽見的」

然而，如以爲美國進步社會人士的代表，根本沒有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意見的可能，那也是不正確的。在美國，出版着相當數量的將真話帶給羣衆的進步報紙和雜誌。其中首先應該指出的，有「工人日報」、幾種雜誌和大多數的職工會出版物。「下午報」（譯者按：該報現已停刊）、「芝加哥太陽報」、以及華萊士主編的「新共和」週刊（譯者按：華氏現已辭該刊主編職），也應該歸入進步輿論

的陣營。這一切報紙和雜誌，都贊成加強大國合作，贊成徹底遵守國際條約，反對幻想世界統治權的美國獨佔資本集團的冒險企圖。在這些報章和雜誌的篇幅中，特別猛烈地批評了杜魯門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計劃。例如，「芝加哥太陽報」率直地寫道，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政治路線，無異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該報指出：「美國人民進行戰爭，並不是爲了這一類的帝國主義，並且他們也不會支持這一類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如果它能够運用於希臘，當然在邏輯上也可以運用於全世界的。」北加羅林那州拉萊城出版的進步報紙「新聞觀察家」(News Observer)說：美國應該拿出幾百萬元來援助窮苦的希臘人，而不應拿一份錢，派一名美國士兵去支持臭名昭著的保皇政府，或是需要戰爭和武力的帝國主義政策。「下午報」說，杜魯門的對外政策是「會招致到筆墨不可形容的憤恨的」。這張報紙的主要觀察家指出，美國的援助，不是用來幫助希臘人民的，而是幫助銀行家、官僚、地主、及將軍們的。

但我們不應該忘記，在那些敢於對人民說真話，不願與自己的良心妥協的，美國進步記者及社會活動家的道路上，橫互着巨大的障礙。西蒙諾夫在他的劇本「俄羅斯問題」中，對這一點說得很清楚。那些看過、或是讀過這劇本的人們，一定記得這部戲裏的主角，新聞記者史密斯會遭遇到多麼痛苦的命運，當出版家命令他寫一本反蘇的書，而他却違抗了命令，寫出一本講蘇聯的真實情形的書

來。

我想舉出一個跟這故事相呼應的實例。許多人都曉得美國的進步記者約翰納斯·史蒂爾的名字。在戰爭期間，史蒂爾是廣播評論員。他對自己的聽衆說了真話，正因為如此，廣播公司的老闆就大不高興。戰爭結束後，史蒂爾被解雇了。他不能在電台上繼續自己的工作了，史蒂爾陷入非常困難的處境：他失去了以前能對他們講話的聽衆。他面臨了一個抉擇——或者是順從老闆之意，不說有利於聽衆的話；或者仍忠於自己的良心。史蒂爾選擇了第二條路。他開始出版一份小型的彙報。如果沒有大量的資金，在美國是很難、差不多說是不能做出版家的。但史蒂爾仍然不斷地鬥爭。他的彙報發行了七千份；訂閱者是一些轉載史蒂爾的觀察的報紙。

在美國的新聞記者當中，這樣的人並不多。但這些人却忠誠地做着自己的事。我前面提過的「受損害的報紙」一書的作者奧斯瓦爾德·維拉爾德，在講到這些人的時候寫道：

「今天，不管他的筆多麼犀利，任何一個在擱樓上居住和工作的人，都不能期望他的聲音會被廣大的聽衆們所聽到，後者的人數超過哈里遜及林肯時代的美國聽衆達九千萬之多，而他們理解和體現美國自由之基本原則的能力，却至少要比那時的聽衆落後兩百年。但是，總有一位未來的預言者會使得大家傾聽他的聲音，如果不是通過日報，那末就通過週報；如果不是通過週報，那末就通過小冊

子，正如亞歷山大·漢密爾登所做的一樣；如果也不是通過小冊子，那末就通過自己在市集上的演說。不管怎樣，真理終會被人們聽見的。」

四 好萊塢屋簷下

註冊商標——「好萊塢製」

無論你到哪一個國家，無論你到哪一個大城市，你到處可以遇見同樣的臉——五顏六色的巨大廣告牌上，沉鬱的加萊古柏用牧童的手槍懶洋洋地，彷彿不大情願似的瞄準着你；有「解剖炸彈」雅號的大膽的麗泰海華絲誘惑地望着你；嬌美的股格麗裹着純樸和憂愁地向着你微笑。而且廣告上的照片相像得驚人：不論是在百老匯、在畢卡迭里、在畢里賽廣場——你到處看到同一的東西：密斯特和密斯接吻，密斯特絞殺密斯，密斯特和密斯跳舞，密斯謀殺密斯特。而在這一切東西之上，都印着一個商標——「好萊塢製」。

昨天如此，前天如此，彷彿永遠如此。更換的僅是姓名而已——製片家是殘酷無情的，他們不能容忍他們「明星」們臉上的皺紋。好萊塢的標準成爲模範，好萊塢的各大公司早已成爲世界電影市場

上的霸王。同時還可以加上一點，戰後好萊塢的獨霸地位是更加强了。美國影片公司的代理人正在澈底收買歐洲的攝影場、發行所、電影脚本、導演、演員。

「不久我們就要成爲山姆叔叔的苦工了，」有一次，傑出的法國電影導演之一杜爾頓擔憂地對我說，「你看，甚至巴黎五十家發行商中，有八家已經屬於美國人。而且所謂「美國獨立發行商」還不算在內呢！他們並且在我們這裏設立了影片翻印廠，每年能出四十部法語對白的影片。所以有許多人愛到好萊塢去，真是不足爲奇了。你想，現在還容易遇見像雷納·克萊這樣的人嗎？你大概還記得他的影片「巴黎屋簷下」吧？他是以美國電影業代表的身份到我國來攝製一部取材法國生活的影片的，像他這樣的人，現在還容易遇見嗎？」

法國電影工作者會憤慨地告訴我關於美國人改造法國影片「白日來到」的故事：美國人收買了這部影片，將它束之高閣，自己依照這部影片的本攝製了一部新影片而租出去放映了。在倫敦的時候，我聽到過一段還要驚人的故事：美國人收買了英國影片「煤氣燈」，甚至不肯化費重攝的麻煩的手腳，將它重新剪接過，用了「索頓廣場謀殺案」的新名字當作美國影片在英國銀幕上放映了。

這一類故事是引述不完的。但是當你現在認識了戰後美國電影藝術，你就不想談寫這些了。戰後好萊塢出現了些新的非常典型的特徵。這些特徵逼迫你不得不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這吵鬧不安的美國

「電影帝國」和重新估價它的傾向……

一 舉 兩 得

一九四六年夏天，法國政府依照美國借款協定的條件不得不撤消壘，將法國銀幕的四分之三讓給好萊塢。當巴黎立刻來到了兩百部美國影片的時候，有幾家法國報紙發表了下面這一段意味深長的報道：

「最好的反共方法是傳佈美國電影。這是美國國務部代表在歐洲訪問了許多國家和研究了使美國影片深入這些國家的可能性之後回返美國時所發表的意見。同時這位大員說，在歐洲不能放映像「煙草路」這樣的影片。這位大員深信西歐大多數國家的政府會協助美國影片的擴張，以便阻礙共產主義的道路。」（引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星期六晚報」）。

電影業是利益豐厚的事業。據一九四七年的材料，僅是英國一國，就每年要向好萊塢朝貢二千萬英鎊。有幾張周遊過全世界的影片簡直使幸運的出口商發財了，例如「傻瓜者」一片就給了華納弟兄五百萬美元，華德狄斯耐從他的「白雪公主」上賺了八百萬美元，賽爾茲尼克因「亂世佳人」一片而神話似的賺了三千二百萬美元。但是影片不僅是平常的商品。依靠這些膠片，非但可以影響買客的口

袋，而且可以影響他們的心理。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戰後國務部認為必須直接干涉影片公司的事務，幫助它們將商品推銷到歐洲市場上去，並且直接指出，哪一些影片應該、哪一些影片不應該運到海外。

譬如「烟草路」當然不會使觀眾對「美國式生活」肅然起敬的。這是根據歐斯金·柯爾德威爾的同名小說改編的，約翰·福特導演，內容是描寫破產的美國農民的貧苦生活。還有那也是約翰·福特導演和根據斯坦倍克的著名小說改編的「怒火之花」，或者一九四六年秋季威廉·華伊勒攝製的「黃金時代」，像這一類影片也不會引起觀眾對「美國式生活」同情的。這一類影片偶而也在美國國內市場放映，——那是因為很賺錢，所以那些控制電影市場的大亨們還肯忍痛維持着。但是對於海外市場，這類影片的道路就被阻塞了。這種影片是不供輸出的。最好還是讓歐洲人欽佩大無畏的美國偵探，欣賞美國女郎的大腿，看着美國的軍事威力發抖吧……

美國老闆已習慣於大來大往。美國每年電影生產的預算超過二億七千萬美元以上。僅是在建築美國電影院這一項下就化費了近二十億美元。在戰爭期間，美國攝影場攝製了二千多部影片，而新聞影片、短片等等還不算在內。同時，看看美國電影的題材是怎樣變化，這個在美國政治中佔着一定地位的龐大的電影生產事業的方針是怎樣，也是很有趣的。

美國電影統計家將影片分成好幾類：先是「武俠片」、「神怪片」、「謀殺片」、「偵探片」、然後是「西部片」、「喜劇」、「恐怖片」、「心理變態恐怖片」等等。這種獨特的統計的分析是意味深長的。假如，近年來，社會問題影片的數量減少了兩倍多，傳記片、歷史片、探險片現在幾乎不拍了。而胡鬧的歌舞片的數量却倍增了。現在特別時行的是「神怪片」、「恐怖片」、「心理變態恐怖片」。銀幕上充滿了幽靈、神祕的紳士等等。

還有一點，也足以表明戰後美國電影的特徵的，那就是宗教片數量的不斷高漲。

好萊塢從未以虔誠出名。所以更有趣，戰後它竟歸依於天主教神父的保護——就是說，美國資本家委託天主教徒來保管電影的思想內容了。

「電影消防隊」

好萊塢的「思想」半公開地是由所謂「美國電影協會」控制的。參加該協會的有在好萊塢起領導作用的美國八大電影公司和大多數其他的電影企業。協會的職能之一是所謂「自動檢查」。檢查的使命是「限制表演不道德的、不雅的、反宗教的和傷害民族尊嚴的場面」，——據正式的文件說。

形式上影片公司並沒有義務將電影脚本呈繳協會事先檢查。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協會有權禁止

任何影片，所以企業家不願意冒險，在電影脚本沒有得到協會贊同之前，他們拒絕和電影脚本作家及導演談公事。

我們有一次和美國電影工作者談天。當我們談到協會是否要和好萊塢的不道德傾向及不雅傾向鬥爭的時候，他們笑了。

「你到百老匯去一趟和看看廣告牌。那裏除了不雅之外，還有什麼？」他們說，「對於這一類事是眼開眼閉的。但是假使你想獲得通過一部電影脚本，其中真實地描寫罷工場面、譴責私刑黑人、警察濫施職權、或者暴露教會的反動作用，那就難上加難了。這一類題材的影片是沒有的，而且也不會有！……」

「哦，那末「煙草路」是怎麼的呢？」我問。

「「煙草路」嗎？第一，這是在一九四一年，那時候在電影企業家中間，甚至認為眩耀左傾是時髦的；第二，不論是「煙草路」或「怒火之花」，都沒有直接觸犯大工業獨佔者的利益。這是描寫我們農村的影片。現在試試看，你還找得着一家放映這種影片的電影院嗎？找不到的，雖然觀眾無疑是會去看這種影片的……」

還有，「美國電影協會」是受着某些天主教團體的反動領袖的影響的。這些反動人物在所謂「道

德聯合會」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如果「美國電影協會」錯過一部對觀眾引起了他們所不願有的反應的影片，「道德聯合會」就以消防隊的姿態出現了。

「道德聯合會」是爲了抵制這種影片而設立的。「聯合會」每月將它所抵制的影片名單分發出去。教會將這些名單大肆宣傳，並且無條件地擁護「聯合會」。祇要舉一個例子，就可以充分證明「道德聯合會」和擁護它的人們的特點了。

戰爭時期，美國有一部影片叫「北極星」（上海公映時譯名「蘇軍血戰記」），導演是劉易士·梅伊斯東。這部影片似乎有點不够真實，梅伊斯東不大了解遊擊隊的生活和鬥爭，不大了解烏克蘭的生活。但是作者題材的基礎是真誠地想深入那些毫不顧身地起來向敵人鬥爭的不屈的蘇聯人的心理和表現這種鬥爭。梅伊斯東攝製這部影片時會化了極大的精力和真正的創造熱誠。所有的演員也是懷着那樣的熱誠工作的；特別是其中安德路斯所創造的那個參加遊擊隊的蘇聯飛行員的形象，顯得非常出色。

於是「道德聯合會」挺身而出反對這部影片了。它反對的理由非常特別。「不能表演德國人的野蠻！」「聯合會」聲稱，「這會對年青的一代起墮落的作用。」還有一個理由更爲可惡：「德國人從俄國兒童身上取血給自己的傷兵，這種事沒有經過證實。以沒有經過證實的事爲基礎的影片，不准放

映。……」

「聯合會」開始大舉進攻這部影片。梅伊爾斯東也受到迫害。幸虧美國的電影觀眾是很正直的，這次進攻結果毫無成就。「北極星」一片走遍了美國各地的銀幕。電影院老闆不顧「聯合會」的歷史性號召，拒絕停止放映這部影片——它給他們賺的錢太多了。

「與我同行」

戰後天主教反動份子並不限制他們對於電影的控制權。他們企圖轉取攻勢和以他們自己的「思想商品」供應者的姿態出現了。

最近百老匯放映一部意大利影片「羅馬——不設防城」時盛況空前。這部影片的題材是很現實的。講的是意大利愛國志士反抗墨索里尼的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的地下鬥爭生活。從電影技術的觀點來看，這部影片拍得很好，看起來很有趣。但是很特別：影片中的中心人物是一個意大利神父，他被描寫成了一個反法西斯鬥爭的戰士。對於意大利反法西斯地下鬥爭，這種情形是否是典型的呢？完全不是！正相反，事實證明，天主教許多反動代表是站在法西斯主義方面的。銀幕上展開了一個理想的神父的動人的故事，他非但向上帝祈禱，而且組織兒童足球隊，藏匿炸彈在祭壇底下，散

發反法西斯傳單，鼓勵共產黨人反對墨索里尼——看了這一切之後，明顯地就會感到作者思想的虛偽和罪惡。事實上完全與此相反。據說，影片製作者都是意大利電影界的進步份子。因此發現他們自主地或不自主地爲不真實的思想宣傳張目時，更感到可悲了。不管他們是否自願如此，但是這部影片是爲了一個確定的目的服務，是毫無疑問的——強制觀衆忘記許多天主教人物在法西斯統治時代所透露過的醜惡面目。

現在作爲好萊塢天主教電影先鋒的是著名歌唱明星平克勞斯貝所創辦的一家公司。這位歌唱家已因演歌舞片和表演歌唱而成爲百萬富翁。他那天鵝絨似的低音每天在空中傳播。他經常參加無線電輕音樂廣播。他的唱片暢銷各地。據一九四七年賦稅統計的資料，平克勞斯貝每星期進益有五、六〇〇美元之多。

不久以前發現，這位歌唱明星成了狂熱的天主教信徒。歌舞場面怎能和天主教祭壇調和，原是很可怪的。但在好萊塢是什麼都可能的。平克勞斯貝自己創辦的攝影場專門拍攝宣傳天主教的影片。已攝製的這一類影片是「與我同行」。最近完成的有「愛爾蘭愛比玫瑰」——這是部反藝術、反猶太的影片，甚至引起了一般美國觀衆的抗議，對於這個新題材，別的大公司也競相倣效——例如派拉蒙公司攝製了「聖瑪麗亞的鐘聲」。

美式生活的內容

有一個美國電影批評家談論「美國電影協會」的狂熱活動時說，該會向觀眾宣傳「美國式生活」，它將這種生活描寫成一首和平的田園詩，其中彷彿沒有鬥爭，沒有社會衝突，沒有貧困，這位電影批評家似乎諷刺地說：

「該協會怎麼能將宣傳「美國式生活」去和傳佈經常描寫狂殺、墮落和病態獸性的影片相調和，這祇有它自己能解釋……」

的確，在美國銀幕上，這些「聖瑪麗亞鐘聲」、「愛爾蘭愛比玫瑰」，竟和謀殺和犯罪的偵探片毗鄰相處。當然這裏也有它的規律存在。有計劃地促使青年觀眾墮落的偵探片的目的，也就是美國汗牛充棟的偵探小說或者是充滿盜匪冒險故事的黃色報紙所追求的目的。它們想轉移觀眾的注意力，使他們不關心當前每一個普通美國人所焦慮的尖銳的社會問題。

美國藝術創造工作者懷着憤慨和羞恥的心情談論好萊塢的墮落，戰後電影藝術水準的人為的降低——儘量簡單，儘量不要複雜的心理過程，因為後者也許會忽然催醒觀眾的思想的。如果是悲劇——那末就是不斷的轟射和追逐，如果是喜劇——那末就是不斷的跳舞，不斷的唱些節奏強烈的、乏味的

歌曲。什麼也不必想！一切都是非常簡單——彷彿留蘭香橡皮糖一樣。而最可恥的是爲了用這種膠片去引誘觀衆而常常掛着美國著名作家名字的招牌。

美國文學界常常談及作家們踏上好萊塢之後改變作風的事。有頭腦的作家和批評家們特別關心的是斯坦倍克。他過去曾經提供過像「怒火之花」和「人鼠之間」（上海公映時譯名「人獸關頭」）這樣的力作，現在無疑地有着向下的傾向了。他在戰爭初起時寫的小說「月落」（上海公映時譯名「月落烏啼霜滿天」）已經比他過去的作品軟弱得多。之後他的作品水準更低。蘇聯批評界會對斯坦倍克的近作「罐頭食品市場」提出了應有的否定的批評，因爲它將墮落的流浪漢的生活理想化了。

「好萊塢嗎？」當我們談到斯坦倍克時，有一位文學批評家沉思地說。「哦，據說，斯坦倍克的遭遇是不能怪好萊塢的，除非……除非你認爲好萊塢使他成爲富翁是好萊塢的過錯。但是，話也說得有理，這個「除非」是很重要的！人一變成富翁，就完全變了。請舉華德狄斯耐爲例……」

於是他告訴我關於斯耐狄創作中的非常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在戰爭前夜和戰爭時期發生的。起初狄斯耐本是個天分很高的窮畫家。他於一九二二年開始爲自己開闢道路，冒險攝製自己的影片。名利並沒有立刻就來。但是狄斯耐堅強不屈地工作。在一九二三年至二五年間，他完成了「愛麗斯」一片，一九二八年銀幕上出現了米老鼠，後來狄斯耐開始嘗試五彩卡通片，最後他的第一部五彩

卡通長片「白雪公主和七矮人」轟傳全世界。狄斯耐終於名利雙收。於是……在一九三八年，他設立了自己的影片公司。

起初，一切彷彿都照舊。狄斯耐仍舊和他那些友好的同人合作。其中大多是有才能的青年畫家和熱心擁護卡通片的藝術家。他們設計複雜的場面，有趣的穿插，使觀眾能盡情欣賞狄斯耐人物的經歷。但是乏味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逐漸開始起作用。影片使狄斯耐的錢越來越多，但是他的同人們却仍舊領着從前那樣微少的薪水，這是他們在狄斯耐剛剛創立自己事業時所同意接受的數目。他們提醒他們的朋友，現在是調整薪給的時候了。而狄斯耐却用沉默回答他們。關係於是破壞，分裂於是開始。戰爭初起時，狄斯耐的攝影場正在攝製「幻想曲」，忽然爆發了罷工，畫家們對狄斯耐說，他們拒絕爲他工作，如果他不高薪水的話。

狄斯耐固執成見。於是一大羣最有才能的工作人員脫離攝影場。密切注意他們這個青年同業的攝影場裏所發生的事變的電影業巨頭是贊許狄斯耐的強硬的，但是好萊塢的輿論界却對他敬而遠之了。

現在狄斯耐是電影企業家了，他越來越少參加創造工作了。狄斯耐的影片也不同了，——裏面已經沒有從前那種樂天的情緒，創造的熱情，永遠追求新的前進的感覺。狄斯耐的影片中出現了常常會殺害藝術的不祥特點——虛偽、不真實。

狄斯耐的新片中有一部叫「南方之歌」(上海公映時譯名「幻遊南海」)。報上盛傳，狄斯耐在大西洋發現了那帶有一半傳奇性的說故事者黑人「李摩斯叔叔」的可貴的人民創作的遺產，他以此為根據而創造了一部新的鉅片，關於狄斯耐所運用的新形式，寫得很多——他攝製了一部由卡通人物和真正人物合演的五彩片。但是觀眾看了之後都漠然無動於中。而且有許多人大為憤慨。原來狄斯耐的這部田園詩似的作品，却將盛行奴隸制的南方理想化了。他破壞了歷史的真實性，他將黑人和白人的關係描寫得非常友好和親近。

同時美國進步報紙上出現了許多反對公映「南方之歌」的抗議信。這些信告訴狄斯耐，說當大西洋城(迫害黑人特別強烈的地方)初映該片時，所有該片的工作人員都被邀請了，祇有創造最出色的說故事者黑人的形象的傑姆斯·巴斯格特却例外。為什麼呢？因為……巴斯格特自己就是黑人。「該片人物的子孫既是這樣對待黑人的，狄斯耐怎能為他們的祖先描寫成黑人的保護者呢？」各報這樣寫道。

狄斯耐沒有答覆這些抗議信……

無情的好萊塢磨坊怎樣摧折天才，全能的影片公司怎樣征服有能而沒有充分意志力的創造工作者和強制他們不依照他們良心和責任而依照美元陛下的指使而工作，關於這種種是講不完的。但是我

預感到，最後讀者會責問：

「對不起，但是有些人不顧一切始終忠於自己的責任，不願出賣自己的靈魂，不肯為自己的才能去換取殘羹冷飯，這些人究竟怎樣呢？好萊塢的創造工作者並不都是沒有原則的！」

不願出賣靈魂的人

是的，好萊塢有着忠誠的、英勇的、值得尊敬的創造工作者。關於他們的活動，這裏應該特別提出來談一談，應該詳細細細談一談，好讓我們的讀者認識他們，並且想像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假使藝術家拒絕為錢袋服務，而想為藝術服務，是件多麼困難的事。

像查利·卓別林、威廉·華伊勒、劉易士·梅伊爾斯東、約翰·福特等等的電影藝術家已在電影界成功地工作了許多年了。卓別林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進入電影界。法國女演員之子華伊勒早在一九二〇年就以副導演的職位的好萊塢工作了。一八九五年生在俄國的梅伊爾斯東也已經在美國電影界工作了多年，十五年前銀幕上的名片「西綫無戰事」會使他聞名全世界。約翰·福特早在戰前就以「怒火之花」和「萬里還鄉」等片出名了。

他們都是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的。卓別林的「大獨裁者」是希特勒的無情的諷刺——這部影片

的價值等於數百枚炸彈：它以致命的諷刺打擊了法西斯主義。梅伊爾斯東，除了「北極星」之外，還創造了許多真實描寫戰爭的影片，其中如描寫小兵生活的「小兵喬埃」（上海公映時譯名「軍人魂」，這部影片的本出於後來陣亡於遠東的戰地記者恩尼·派爾的手筆），還有描寫傘兵登陸意大利的影片「大陽下散步」以及「紫紅心」（即「黑龍會陰謀」）一片（「紫紅心」在美軍中是受傷的記號）。約翰·福特攝製了「中途島之戰」，「我們在半夜航行」，威廉·薩伊勒會親上前綫作戰。

戰爭時期，特別是在史大林格勒之戰時期，美國電影觀眾表現出對於描寫蘇聯的影片有着極大的需要，許多影片公司估計到市場的趨勢，都自願攝製這一類影片。戰爭影片的生產是受到政府鼓勵的；而且這一類影片的進賬也很可觀。那時候進步的電影導演工作自然很多，好萊塢各大公司都樂於請他們去工作。

現在局勢完全變了。像當年拍攝過「出使莫斯科」和「大西洋之戰」（描寫護航隊到蘇聯去的影片）的「華納兄弟」這樣的大公司，現在也情願拍攝廉價的歌舞片了——因為這是收入可觀的商品，而且不會冒險，沒有麻煩。

凡是不滿意工匠式的工作，而想找尋嚴肅的社會題材的導演，現在都無法進入各大影片公司的攝影場。他唯有或者依靠自己的資力，如果有的話，否則就到次等的小攝影場去碰運氣；但是這樣的攝

影場大多沒有必需的物質條件。

卓別林有着自己的攝影場，不必依賴電影獨佔資本家。但是惡名昭彰的「道德聯合會」和其他反動組織已經向許多影片發行商恐嚇了好幾年了，他們要求停止放映卓別林的影片。卓別林本人也被宣佈爲「不道德者」。

梅伊爾斯東現在拍攝了「凱旋門」一片。這是描寫一九四〇年巴黎淪陷的。起初沒有一家大公司願意投資拍攝這部影片。梅伊爾斯東最後才在一家獨立的小公司中找到了容身之地。

比較幸運的是華伊勒。華伊勒在蘇聯是以「小狐狸」一片出名的。從前繞歸來之後，他又爲山姆爾·高爾溫羅致去了。高爾溫是好萊塢統治階層最獨特的人物之一。他年紀已過六十，華沙人，以小規模經營手套業起家。一九一三年，高爾溫看到電影業可比手套業賺更多的錢，於是與其他商人合資組織了一家很小的影片公司。那時電影事業正欣欣向榮，五年之後，高爾溫成爲一家獨立公司的老闆，儼然面團團富翁家了。他和別的同業不同，善於，而且喜歡冒險。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是感覺却非常靈敏，他能測度出普通美國人這時最感到興趣的是什麼，也就是最能賺錢的是什麼。同時，高爾溫和大多數美國電影企業家不同。他決計不怕所謂「左傾題材」。他認爲這種題材準可賺錢。觀衆對於涉及社會題材的影片的興趣是很高的。這就是高爾溫當年出資攝製「小狐狸」和「北極星」的

原因。

高爾溫的影片還有一個特點：他的影片總是攝製得非常完善周密。高爾溫總是給予導演所希望有的攝片的一切條件。一年中他出片僅數部，但是他攝片時常不惜工本。因此每逢他的公司完成一部影片時，總要轟動一時，觀眾們得悉高爾溫有新片公映，就像潮水似的湧到電影院裏去。

而最驚人的成功是由高爾溫出資拍攝的華伊勒的戰後第一部影片「黃金時代」。這部影片描寫的是美國復員軍人的悲慘命運，他們回返祖國時希望一切都變好，希望到家後能見到一個革新的世界，但是結果仍舊墮落在毫無生趣的、不自由的裂縫中。這題材，對於華伊勒顯然是特別接近。他自己就曾參戰三年，也許正由於這原因，這影片才會透出這樣熱烈和強力的氣息。

但是這幾乎是最近美國絕無僅有的一部真實的影片。左面右面、前前後後、到處燃燒着、閃耀着、迴旋着的，依然是好萊塢層出不窮的那些大事實傳的「謀殺片」、「恐怖片」、「神祕片」。

五 法西斯的陰影

倒行逆施

在美國，有許多入講着、寫着、並且辯論着法西斯的威脅。一批人解釋它是已臨美國頭上的真正威脅。另一批人反駁道：「胡說！美國人人生來就受不了嚴格的管束。他們怎能與法西斯獨裁妥協呢？」第三批人則聳聳肩頭：「爲什麼要猜測未來呢？活着瞧吧。」然而，無論是第一批、第二批、或第三批人，都沒有否認，在美國的社會及政治生活中，那引起一切民主人士深剗不安的現象，已經大大地加強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廿四日，美國參院批准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即日生效。它所加予職工會的限制，是如此的殘酷，以至人們稱它爲「奴役勞動的法案」。這個新法案限制工人罷工及簽訂集體協約的權利；准許企業家提出對職工會的訴訟。條文之一警告說：凡職工會希望獲得正式承認，應脫離

「共產黨」的領導；自然，這頂紅帽子可以加在任何一位不利於企業家的人頭上。禁止職工會徵募政治運動的基金，例如競選總統及國會議員的基金等。這樣，就實現了美國反動派的老幻想，即給工人階級穿上一件「囚衣」。

「國會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已經成立，它的基本任務，便是對美國的民主人士施以無情的懲罰。醜惡不堪的案件一個個接踵而來：他們依據刻板的陳腔濫調「不尊敬國會」，而審判被控的民主人士（在法官們看來，民主人士拒絕交出他們的文卷，以及拒絕向上述「委員會」作口供就是「不尊敬」）。特別是對「美蘇友好協會」的領導人以及對「援助反法西斯流亡者聯合委員會」領導人的控訴案，就是依照這條公式而提出的。值得注意的，代表國務院出庭的亞力山大說道：

「凡一個組織的名稱中有「反法西斯主義者」這個術語的，就意味着這個組織是參加共產主義陣綫的。」

要把大批美國的社會著名人士捉將官裏去，僅僅這一句話便足够了。著名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艾斯勒，僅僅因為他被傳訊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去的時候，在開始答覆各項問題之前，想作一個三分鐘的聲明，便被判處罰金一千元。這委員會發明的好萊塢案件，已經得到了醜惡不堪的聲名。

該委員會主席湯麥斯，要求司法部長開始控告……整個共產黨及其活動份子。當他在一九四七年

六月開庭審訊美共總書記丹尼斯的時候，他說：委員會已擬就一份參加「反美組織」的嫌疑人物的名單。名單上有……一百萬個名字！這數字清楚說明了美國反動份子懲罰國內民主人士的計劃，其規模多麼宏大。

勞工部長許維林巴赫，於一九四七年要求議會代表宣佈共產黨爲非法政黨。他說，在他的部裏已進行「以揭發共產黨爲目的」的個人整肅，同時，刑事政治偵察機關也參加了這件工作。

共產黨被禁止担任國家職務，禁止參加軍隊。而在各私人企業當中，把他們從職位上趕走。杜魯門解雇「不忠」職員的無恥命令，已由全世界報紙廣泛刊載：這頂帽子不僅適用於共產黨員，而且也適用於一切不願無條件接受摧殘民主自由的龐大計劃的人們。由於這命令而被「檢查」的，有二百三十萬職員。爲了「檢查」，他們利用了聯邦調查局（即祕密警察）、「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陸海軍間諜等機關所有的材料。一切被檢查的人，都有特別卡片保存在中央卡片局裏。在每一個政府機關及企業中，都設立了特殊的「監察忠實內務處」，並且選拔了受過特殊「保安」訓練的工作人員。不幸的命運，正在等候着有「不忠」嫌疑的人們。杜魯門的命令使他們甚至喪失了法律賦予刑事犯的交保權利。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前國務院官員馬爾尚尼被控否認自己爲共產黨員，因而被判三年監

禁。

當他讀到判決書時，馬爾荷尼憤慨地說：「這是對國家司法的諷刺。戰爭時期，政府會褒獎我的工作。現在同一個政府又把我送進牢獄裏去。要瞭解政府這種無情行爲，必需知道，在今天的德國，那些被控以與我同樣罪名（「對美國政府作虛偽的供述」）的人們，僅判十天監禁，或者根本不加懲罰。這就是戰爭結束兩年後的「司法」：對納粹敵人只判十天，而對美國的退伍軍人却判長期監禁……。」

在軍隊中，對「不忠份子」的整肅，進行得特別嚴厲。奇怪的是湯麥斯的委員會，要求陸軍部長立刻將參加一九四七年紐約五一示威遊行的八十名軍官及一千五百名兵士，送交軍事法庭。湯麥斯說，他的特務人員會到過示威的地方，照了許多像片，並攝成電影，這些東西他已作爲「證據」而交給陸軍部了。

反動派對於進步份子的憎恨，擴展得如此廣遠，甚至議會中的世界戰爭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決定取消對共產主義者表示同情的退伍軍人們的救濟金。該委員會提出的法案原文說：「凡希望獲得救濟金的復員軍人，應宣誓聲明，他不是共產黨員，不同情共產黨的目標，以及與蘇聯、與充當蘇聯工具（?!）的任何國家沒有關係……。」

要讓充份體會因反動派的這種攻勢而在此地造成的一切不信任、恐怖與茫然若失的氣氛，必需親自到美國來，必需深入她的不安的日常生活。

好萊塢事件

在美國報紙正充滿了所謂調查好萊塢「赤色威脅」的最轟動的新聞的日子裏，我碰見了兩位剛由華盛頓來紐約的電影導演。他們是憤慨、痛心欲絕了。

「這……這簡直是羣魔亂舞、瘋子舞會、蠻荒野人們的宴會！這除了沒有調查之外，一切應有盡有！」其中的一位在房裏踱着方步，機械地瞋着門，神經質地說道，「湯麥斯和倫金（「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主持人——作者）對於他們稱之為「赤色份子」的人，根本沒有一件證據。他們加在被告身上的一切罪行，便是演出了兩部電影：「俄羅斯之歌」及「出使莫斯科」。但是，甚至湯麥斯本人的腦袋裏也不會想到，說這些電影破壞了我們國家制度的根基。可是，正如你們看見的，他們怎樣對付被傳訊的作家和導演呵！他們大罵他們，不許他們講話，昨天又把第三者擲出會場！原告們的證人，製造了多麼愚蠢的謠言！……」

「你不會相信，但却是事實，」又一位談話人插嘴道：「一位女演員的母親羅吉斯說，作曲家漢

斯·艾斯勒故意「爲好萊塢創作俄國情調的消沉和悽涼的音樂」。你覺得可笑嗎？但你想像一下，正是這類「叛國」的證據，便足以宣佈艾斯勒是「音樂界的卡爾·馬克思」了，送他到法院，決定把他逐出美國……。」

「好萊塢的調查」表現了真正無恥的特質。湯麥斯委員會的頭子們，滿懷惡意地想進攻進步的藝術工作者，但他們自己暴露了自己。某些報紙想起了，早在幾年前，該委員會的主持人湯麥斯，甚至想把羅斯福也控以共產黨之罪。他當時說道：

「顯然，「新政」是與共產黨一同工作的。「新政」，如果它本身不是共產黨，那末就是全面支持共產黨的。」

當時，人們都笑湯麥斯。而現在，他利用對他有利的環境，惡狠狠地想與羅斯福「新政」的承繼者們算一算賬了。

著名的進步作家亞爾培·馬爾茨說：「爲什麼這個委員會要消滅我呢？由於我寫的東西嗎？我們來看一看我寫了什麼吧！我底長篇「十字架與箭」出版了十四萬部特別版。這部書是戰時爲我們軍隊服務的政府出版社出版的。這書是爲國外的美國戰士們出版的。我的短篇小說，被三十位美國出版家重印了三十多個集子，看來這些出版家，大概也在從事「破壞活動」吧。我的電影「海軍的驕傲」；

最初是在紀念美國軍隊把日本人逐出菲律賓那天的廿八個城市中上演。另一部電影「直搗東京」，是第一次顯示了美國潛水艇中的一切，並且獲得海軍許可作為正式的教育電影。我的短電影「我住的那間房子」，在反種族歧視的鬥爭事業中有所貢獻，而獲得電影藝術及科學學院的特種獎。我的短篇故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一九三八年，作為最佳的美國短篇故事而得到歐亨利獎金。」

◎ 而勞森、特倫波、拉德納等著名作家的「非美活動」，又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他們反對使用私刑，寫出為西班牙共和份子辯護的書籍，積極參加反希特勒德國及帝國主義日本的鬥爭。甚至控告拉德納的罪行是：他曾在對國會縱火案的宣言上簽名，以及他參與起草「人類友愛」的標語。

莎 士 比 亞 左 傾

湯麥斯為竊取「原告證人」的陳詞而舉行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會議，已變成了一幕標準的醜劇。「紐約先驅論壇報」在這幾天中，甚至認為可以發表「「羅密歐和朱麗葉」中的赤色宣傳」這篇雜文，這也不是偶然的。那篇雜文的作者潘奇萊寫道：

「有人告訴我說，華盛頓的一位湯麥斯先生，想找點關於共產黨的情報。就我所知，他正在進行調查，並且對於電影裏的共產主義宣傳很感不安。在一部影片中他發現了赤色宣傳，說有一個人拒絕

搶劫窮人，而另一部電影「黃金時代」，則將銀行家們的醜事大加描寫，據湯麥斯的意思，這就證明全部電影都是克里姆林官所唆使的。因為我沒有時間上華盛頓，我便決定將我這證人的陳詞，發表在報紙上，來給湯麥斯先生參考。爲方便起見，我現在引述他的問題和我的回答：

「潘奇萊先生，您的意見如何：假如您碰見了共產黨，您會猜出他是共產黨嗎？」

「唔，當然……」

「您生平可曾見過共產黨？」

「戰爭的時候，我同幾個俄國水兵坐過公共汽車。」

「好極了，好極了！那末您就是共產主義問題的權威了，請問您，您看過帶有共產主義宣傳的電影嗎？」

「當然看過，真的，您記得「羅密歐和朱麗葉」這部電影嗎？」

「當然記得的！你可否說明，這部電影在那些地方是支持共產黨路綫的嗎？」

「非常高興！在第一幕的第一場，有一大批叫做「市民」的人，大叫「打他們，打倒卡普萊蒂！打倒蒙泰基！」」。

「您是想說：「打倒資本家！」」

「不是，是卡普萊蒂。但無論如何，卡普萊蒂和蒙泰基的門第總是資人家。顯然，這些平民是在呼籲革命！」

「我也是這麼想。您還記得一些什麼嗎？」

「當然！在同一場，本浮利奧說：「羅密歐，你的錢沒了，有什麼苦惱呢？」羅密歐答道：「當你不能使它快步如飛的時候，你就要悲傷了。」換句話說，羅密歐要求額外工作的工資，並且希望有一間調節空氣的浴室，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有趣得很。您關於這位羅密歐可以講點什麼嗎？」

「自然可以！他強迫朱麗葉接受黨的路綫。在第二幕第二場中，他對她穿得過於講究，表示不滿。」

「您以為：他能使她信仰共產主義嗎？」

「當然！不應忘記，她是這個城市裏的名門之女。雖然如此，她却高聲說：「名聲有什麼道理？被我們稱為玫瑰的東西，即使叫做別的名字，也會發出同樣的芳香。」就卡普萊蒂家的女兒來說，這

① 英語中的「資人家」一宇爲 Capitalist，而卡普萊蒂 Capulet 與「資人家」讀音相近，故有此種說法

——譯者。

是非常激烈的話！」

「您可有什麼證據可以直接證明，這劇本是反美的嗎？」

「在第五幕第一場中，羅密歐正說了這種話，當時他想問那窮藥商買毒藥。藥商堅稱，法律禁止他出售毒藥。羅密歐回答道：「無論人世，無論人世的法律，都不是你的朋友。沒有一條法律能使你發財。資金就是人類靈魂上最毒辣的毒藥，它在這令人厭惡的世界上所造成的殘殺，比你拒絕出賣的那些可憐藥品所能造成的多得多。」

「非常感謝，這已經很够了！……」

在迫害下鬥爭

許多報紙要求停止那已成爲社會醜聞的好萊塢案件。上述「紐約先驅論壇報」，對湯麥斯憤怒地指責道：「好萊塢的調查，製造了許許多多荒唐的笑料，此外就什麼也沒有了。」但這次不能阻止湯麥斯—倫金的委員會，把十位好萊塢的進步份子抓到被告席上。其中兩位，決定拒絕答覆他們是否爲共產黨這個問題，八位拒絕答覆他們是否爲「劇作者聯合會」會員。

在這樣的環境中，必需有不小的勇氣，才敢針對着美國的當朝統治者們，發出如被湯麥斯—倫金

委員會所懲罰的電影劇作家道爾敦·特倫波所作的那種聲明。他說：

「這委員會的委員們，以及其他的反動份子們，已經在我們首都造成了恐怖與鎮壓的氣氛。你們把華盛頓變成了這樣的城市；那兒沒有一位職工會的領袖能相信自己的電話；那兒的老朋友們不敢在公共場所互相招呼；那兒的男男女女只有在行駛的汽車中，或露天的地方說話才不怕被人偷聽。我們的首都，現在使人想起國會縱火前夜的德國首都，而那些記得起一九三二年秋天的德國歷史的人們，又聞到了這地方的煙味。」

湯麥斯不許特倫波在該委員會的議席上，宣讀這個聲明。劇作家厲聲說：

「這是美國集中營的開端！」

出席會議的公衆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但爲這個抗議的表示，作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湯麥斯將他交付法院審判，而特倫波所服務的那家電影公司，則把他一脚踢開，不管根據他的劇本而攝製的電影，有很大的成就……

幾天以後，在費拉台爾菲亞，又演出了幾齣好戲，這不得不叫人想起那位作家的預測。「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的一個地方機關，要求准許他們在有歷史紀念意義的「獨立廳」^①中，召集抗議美國反

① 這是美國「獨立宣言」簽字的地方——原註。

動派胡作亂爲的羣衆大會。市政當局拒絕了他們。當時「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又要求允許在「獨立廳」前的公共廣場上召集羣衆大會。市政當局不能拒絕了，但却公開聲明：他們拒絕「採取維持秩序之措施」。這是向「美國軍團」○中的法西斯打手發出的信號。他們攻擊與會的人們，用化學炸彈投擲他們，大吹警笛來擾亂演講人的聲音。「美國軍團」的打手們，甚至不怕麻煩把囉囉囉大叫着的火車頭開到廣場上來。當時在台上演講的，是曾任美國總檢查官的八十一歲的老法學家法蘭西斯·康恩，法西斯份子對他大施攻擊，他們推開攙扶着這位老人的同伴，他們毆打他。康恩搖幌着身體，仍然登上演說台，喘着氣說：

「我們是在「獨立廳」這幢房子之前，是在先輩們爲合衆國取得的自由的象徵之前……。如果我們允許他們蠻橫無理，美國的自由就陷入險境了……。」

這時候，「紫紅心」軍團的頭子賴布爾跳上了演說台，滿不在意的推開老人，對自己的小伙子們大聲叫道：

「恭喜你們！……大會結束了……。」

類似的無恥事件，發生在特蘭頓、勃里奇波德等城市，甚至也發生在屬於紐約一區的布魯克林，

○ 美國的法西斯組織。

那兒，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晚上，曾發生流氓搗毀進步組織的俱樂部事件。在斯特勞斯街及皮特金路的轉角地方召集的羣衆大會上，搗亂份子從演講人手中搶去美國國旗，並且將它撕成碎片。

美國的宣傳，竭力把這一切暴行說成「僅僅是」反對共產黨的事件。他們的辯護，最低限度可說是奇怪的，如果知道，共產黨在美國是合法的，並且根據憲法它也享有其他黨派所享有的同樣自由。可是事實却說明，這只是以共產黨爲藉口，企圖掩人耳目。實際上，明目張胆的恐怖政策已真正施展到一切進步組織的頭上來了。

例如，十一月十五日在加利福尼亞州某城，有二十名「美國軍團」的打手，闖進一家私人的屋子。他們嗅出這屋子裏有一羣人集會，要發表呼籲，支持華萊士競選總統。這個軍團的團員們翻箱倒篋，攝取與會者的照片，記下他們的姓名，並命令他們在十分鐘內離開。在羅且斯特城的一所中學裏，破獲了可怕的政治陰謀：圖書館中發現一本書：「二十位現代美國人」，其中華萊士的傳記與聯邦調查局局長愛德加·胡佛的傳記排在一起。這本書便被沒收了，但事情並不就此完結：天主教組織要求立刻對該城的全體教師進行「忠實檢查」。在阿特蘭和邁康這兩個城市，法西斯的三K黨要求市府在華萊士演講的時候，強制禁止黑人參加。

沒有人稱華萊士爲共產黨。但大家知道他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事實告訴我們，僅僅因爲這個緣

故，這位前副總統及現在被提名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的一切同情者，就有資格被列入「赤色份子」的名單了……。

一九四六年，在美國到處嚷着喬治亞州破獲法西斯組織「哥倫比亞人」的故事，這個組織的目的，是要推翻現在的國家制度，建立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獨裁，以及消滅黑人。這組織在形式上已被解散。他們的黨魁荷馬·魯米斯也被審判過了。但下文如何呢？直到現在他仍然自由自在，並且繼續幹他的罪惡勾當。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報上又登出消息，說他參加底德律的法西斯大會，並且跟另一個法西斯組織——「美國至上黨」——的領導人傑拉爾德·史密斯一同發表演說。大約也是這時候的消息，說還有一個法西斯政黨在活動，名叫「民主國家黨」，總部在芝加哥。這個黨的口號，如合衆社所報導的：「生活即鬥爭，鬥爭即戰爭，戰爭即生活。」

所以，法西斯份子的破壞活動，實際上仍舊沒有受到懲罰。

政府的官員們，只在對付進步組織的代表們時，他們才具有「強硬」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在美國，「危險組織」的黑名單已經公佈，如果對他們表示同情，那就會被認為是最可怕的危險份子。這張名單中，有全國美蘇友好協會，有參加過西班牙的反佛朗哥戰爭，而在和法西斯主義作戰的時候犧牲了「八〇〇人的亞伯拉罕·林肯縱隊」的退伍軍人組織，有一八〇萬會員的國際工人團（該團為

自願的保險組織），以及許許多多其他團體。就美國當局的標準而論，不僅這些組織的會員，甚至和他們相識的人，都是犯罪的。

「紐約先驅論壇報」是很難說它有同情「赤色份子」之嫌的，但在報導被認為「不忠實份子」。而遭免職的一羣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時，它寫道：

「無疑地，他們當中大多數都是忠誠的。例如，其中有一位的免職原因只是他在做學生的時候，由於好奇而造訪了左翼黨派組織的羣衆大會。第二位是因為他和一個人相識，這個人的朋友會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支持共和份子。第三位的名字出現在黑單上，因為他是出售左翼文學書店的顧客。第四位是因為從前曾在一位多少有些左傾的著名教授那兒當過技術人員……。」

「民族」雜誌在今年（指一九四八年——譯者）一月份，公佈了一串事實，證明警察對付有「叛亂」之嫌的科學工作者，非常專橫無理。許多科學家在政府機關與私人企業中的職位都被更換，甚至不許他們有詢問的權利。

有一位著名的美國生物學家，他主持軍事機關的一個重要科學研究部門才三個月，便接到命令在廿四小時內「辦理移交」。他們並不給這位學者解釋，爲什麼要這樣對待他，一直經過了好幾個禮拜的探問之後，才在華盛頓獲知他被免職的原因：有一位「保安機關」的代表，認爲他對於這項工作是

「不適當的人物」。原來軍事當局指控這位科學家有「危險的關係」，意思是說他時常向產業職工大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繳納基金，以及資助援助反法西斯流亡者聯合委員會，並且在蘇聯的新聞刊物上簽名。

「民族」雜誌選舉出兩位物理學家（他們是一對夫婦）的意外事件，因為他們要參加原子能委員會的實驗工作，而離開了「通用電氣公司」。但是他們並沒有得到實驗工作，因為他們弄不到「忠實保證書」。他們爲了要得到這個證明文件，白白奔走了八個月。最後美國科學家聯合會解釋道：不發「忠實保證書」給這兩位科學工作者，是因爲丈夫曾在一九四六年表示支持工人罷工，反對「通用電氣公司」。

九月初，驚人消息傳遍了美國報紙：有一位低能的生物化學家庫爾特·萊昂，建議草擬思想統制機構的……組織計劃！萊昂說道：靠着這種機構的幫助，就可以「分析並控制共產主義的傳染病」和「建立健全的理智，使這種不幸成爲不可能」。自然，美國的某些集團，希望全體人民都經過特權機關的檢查，把人們的思想能力消除得乾乾淨淨，或至少把「危險思想」紀錄下來，如庫爾特·萊昂所提議的那樣。然而，這一切據說是與他們無關的，但事實却說明，殺氣騰騰的反動派的胡作亂爲，已引起與他們預料相反的結果：許許多多美國人漸漸張開眼睛來看國內所發生的事件了。然而，美國反

動派却更加頑強地一心想把人民的頭腦弄暈，變成傻瓜，搞成清一色，發揮他們的低級趣味，以便忘掉一切其他事情，消除他們對公共生活的興趣。

傳佈愚民「文化」

一九四七年秋天，我在百老匯看了一部大年夜殺人的影片。殺人案是好萊塢常用的題材，難得一部電影裏沒有倒在地上的屍體。在每一個攝影場中，都積存着大堆製造得非常精緻的實業鉅子、流浪漢、貴婦人的模型，這些東西都是備作墜岩投海，給利斧砍為斷片，或者投在狂奔疾駛的車輪底下之用的。因此，新年的題材編製在槍聲的伴奏之下，這並不是奇怪的。但是這部電影的作者們，並不限於庸俗的兇殺案件：他們決定在新年的夜晚，大談其屍體哲學。這種「哲學」，正是代表那些對於美國的冒牌文化感覺興趣的人們的一定利益的。

這部電影的女主角（社會上的一位美婦人）在一九四五年新年的夜晚，當一羣慶祝新年的人們在百老匯鬧得喧天沸地的時候，殺了自己的丈夫，一位酒徒和白相人。但同時她（一顆天真而善良的靈魂啊！）又對自己的行為後悔。這時候幸運之神來造訪她了，神明願在一年之內，復活她那游手好閒的丈夫。這婦人真幸福啊！但過了一月又一月，她確信她的懊悔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她的丈夫會再去

釀酒與胡鬧。這時候，她的一位朋友神經失常了，給送進瘋人院了。這位主角在苦惱、沉悶、難耐中度過了三百六十五天，這時又有成千的人羣聚集在百老匯，像往常那樣，一邊花天酒地、談情說愛，一邊迎接一九四六年。電影的女主角則躲在臥室裏，期待着什麼必然降臨的事而嚇得發抖。差五分鐘十二點了……當擁塞在百老匯歡度佳節的人羣散去時，那被自己的愛人所拋棄的、陰森森和喪魂失魄的丈夫，突然進入屋子了。差一分鐘十二點了……他開始去扼殺妻子。正在這一刻，槍聲響了，原來是女主角的朋友從瘋人院中跑出來把這位丈夫殺死了。四面的門窗是緊閉着的。神明的話兌現了。他們把丈夫的屍體偷偷運走，再把這個瘋子送回瘋人院，女主角便心安理得地過她的新年，因為沒有理由憐憫在去年的新年夜被她殺死的丈夫……

這部塗滿了神祕色彩的電影的哲學，對於戰後美國的精神生活，是很典型的。電影、無線電、文學、教堂、——所有一切使人們的身心發生感情作用的工具，在這裏都動員起來，向普通美國人說明：最好和最便當解決爭吵與疑慮的東西，是手槍、拳頭，或者連發手槍。上天所讚美的，正是這種方法。

兩個月的時光中，我在百老匯至少看到五六部富有同情心的天使與匪徒密切合作的電影。例如「天知道」這部影片中，天使麥克下凡搭救匪徒杜克·白倫的靈魂。這匪徒教他打架和開槍。天使將

匪徒的槍筒放在腦燭上燻黑，使它不致閃出光來，同時向上帝報告說：「以前，這東西可以打死一個人，而現在一下子就會打死六個。我現在還不能完全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就我看來，杜克的心腸是好的，雖然他的腦子不大正常。」

天使帶着匪徒上教堂去，并且強迫他將錢投進樂捐櫃裏。當那位匪徒執拗不願的時候，天使打了他兩下耳光，并且帶着教訓的口吻說：「教堂就是郵局，我們可以從它那兒接到家信。」耳光是使匪徒信服的理由，於是他成爲信徒了。這之後，他又去和另外兩名匪徒作決鬥，天使揮開了他底敵人的子彈。最後這位匪徒終於變成標準的基督教徒，而天使也就昇天了。

老實說，普通的美國人并不喜歡宗教，雖然他們口裏不說這話。他們不相信有來世存在：因爲在現代技術的世界上，要替舊約書上的上帝，找得一絲可入的縫隙是很難的。正因爲如此，美國的廣告大師們便運用種種方法，要在許許多多美國人的眼睛中，抬高美國式上帝的身價。例如在華盛頓，星期日你只能在教堂裏買到威士忌，如果一個美國人想乾一杯，他便會情不自禁的一步一步走到牧師那裏，而他既給你一杯威士忌，同時也給你一個愉快的禱告，或者給你放映一部有迷人的小天使的宗教影片。而那些畢竟拖不進教堂的人們，則受到成千成萬三教九流的江湖術士們進攻，這一流人物在美國非常之多，特別是在戰後的幾年中。

甚至在若干報紙上面，與股票行情、跑馬消息以及鬼案特寫一起，你每天可以讀到江湖哲學家們的訓示。在美國一家銷路最廣的報紙上，天天有一欄「今天你的星座」，由預言家麥里昂·德利歐撰述，他用中世紀寶狗膏藥者的語言，每天對自己的讀者說教：

「今天月亮進入獅子星座。午後它會立刻轉變各種情趣，造成一些疑難，容易光火，以及引起許多多意外。講話及做事宜小心。今日不能辦理大事。如果你們的沉重心情和陰暗情緒，一直拖到晚上，應避免寫牢騷信來滿足自己。否則就會弄到不可收拾……」

據十月十九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發表的統計，單是心理學方面的術士們，在美國現有二萬五千左右，這是些數不清的「心理問答專家」、「情緒顧問」、「個人助手」等等。尙未失去思考能力的美國人，俗稱他們爲「心理醫生」(Psychognack)。每一次要從心地純良的來客身上索取十元美金的「心理醫生」，他們握有心理分析學、摸骨神相學、自然診療法、形而上哲學之類的博士文憑。這些文憑是由可疑的教育機關，如芝加哥的「萬有真理學院」之類發給的，這些「學院」教授着這類「科學」，如「實用形而上學」、「個人神祕論」、或「祕傳的共濟會修身大道」①（這裏我們順

① 共濟會 (Frank-maconerie) 爲十八世紀初國際性的宗教及哲學祕密團體，會員自稱 Franc macon。意即

「自由石匠」。否定民族及宗教的排外性。把自己的行爲作爲提高道德的表率。宣傳聖慧的仁愛。主要以有

便提一聲，共濟會的學說在現代的美國是非常時髦的。據獻出那本替北加羅林那州共濟會（指美國資本家——譯者）講話而大事反蘇的「老實話」一書之稿酬的貝爾納斯，也屬於「自由石匠」之列。）

所以事實說明了，在這裏，在這工業生產已有如此廣泛發展、技術水準已提到如此之高的大陸上，胡作亂為的暴行、中世紀的野蠻作風、抖動叫囂的癩痢症，却死而復甦，從各個角落裏爬出來了。美國人已經變成害怕黑貓、十三、星期五的習慣。他們養成相信預兆的習慣，而成為宿命論者。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是意外的病症嗎？是這些面帶優相的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嗎？不是的！宣傳宿命論與迷信，已成為那些要把許多美國人變為愚蠢、唯命是從、失去判斷力的先生們的狡點計劃的一部份了。

以純良百姓為對象的一部份美國文學，也是服從同樣目的的。我指的是所謂《Murder story》——謀殺故事。強大的美國印刷業，把上等紙張印成的、售價低廉得不堪想像，但却毒害讀者意識的書籍，大量拋到書市上去。許多美國人在買莎士比亞或馬克吐溫的集子之前，得再三考慮。要買這樣的一部書，須付出好幾塊美金。而價值幾分錢的「謀殺故事」，他是不必費什麼腦筋就可以得到的。

神論的世界觀，共同的道德見解，熱心助人來團結人們。凡參加該會的人，須經嚴格的考驗，以及要有體

說。

——譯者。

至於這種「文學」究竟是些什麼東西，現在我引用「紐約鏡報」星期版的一幅廣告，便可以給你一個充分詳盡的說明：

『五本輝煌偉大的新書，全部只售一元！』

「大匪幫」、「有史以來的最大越獄案」、「有史以來最恐怖的十大罪行」、「偵探如何破案」、「魔法的祕密」。

如果你胃口敏感或神經衰弱，請勿閱讀此書！

這些書會使你頭髮直豎，使你毛骨悚然，使你口瞪目呆，使你血液沸騰。

書中詳細寫出美國匪徒們驚人的、大胆的、刺激的血腥事蹟，全盤道出他們驚人的殘忍。」有許多美國人，把自己的錢寄給這種在報上大登類似的無恥廣告的、肆無忌憚的出版家，而換來五本充滿血腥味的書本，以殺人與搶劫的歌頌來毒害他們的腦子。但問題不截止於宣傳這種罪惡。他們還有自己的政治企圖。《American Mercury》雜誌舉辦的這一類佳書的競賽中，有一位寫過一本「一九九九年的美蘇大戰」的傑拉德·赫爾德獲得二萬五千元的頭等獎，這不是偶然的。

暴徒訓練所

這種教育制度培育出來的果實，已使他們自己有所感覺了。美國人埋怨着空前增漲的罪行。報紙上每天登着野蠻的兇殺、光天化日下的綁票、強姦等消息。去年秋天，「美國軍團」召開大會的時候，那由犯罪文學、墮落電影、以及煽動性反蘇演說所培植起來的好漢們，就鮮明地呈現在紐約市民的眼前了。在這個大會閉幕後幾天，我們到了紐約，全城正處於它所感受到的新鮮印象之下。那些紐約人講給我們聽的東西，看來似乎難以相信，但刊在一切報紙與雜誌上、特別是「生活」雜誌上的照片，却肯定了這些故事……

「美國軍團」——這是一個組織，其任務在腐化會參加世界大戰的人們的自覺意識。他的軍事化的編制，使我們想起德國的衝鋒隊，而該軍團團員們所受的教育，也和衝鋒隊員所受的差不多。當這軍團在紐約召開大會的時候，上級給了警察們一個特別的指示：不必過問該軍團的行動。結果，這幾天的紐約，可說是讓這般橫行霸道的好漢們任意擺佈了。

這裏有幾張「生活」雜誌在這幾天裏登出來的圖畫：一桶水從第一流的「塔虎特」大飯店的窗口，倒在一位行人的頭上，一個穿白襯衫而不把衣腳塞進褲子裏去的肥頭大耳的軍團團員，把一個撲

落投在一位過路小姐的背上，撲落上有根電線接在他衣袋裏的高壓蓄電池上，弄得那位小姐大發神經，行人往旁邊躲閃；一個軍團員騎着馬跑進一家旅館；有三個軍團員包圍着一位小姐，一個抓住她的胸口，另一個用水淋她，第三個則和行人大吵大罵；幾個軍團員的棍子上掛着一條發臭並且已經半腐的魚，向行人的臉上拋擲。所有這一切，都一古腦兒說成是「退伍軍人」的胡鬧。

當我們到紐約的時候，許多商店的櫥窗內，還貼着「歡迎美國軍團！」的標語。大會時期出售所謂「實用惡作劇」的道具的特殊商店，還沒有打烊，而這類道具，正是軍團員們在大會上聽了一長串大聲吶喊的反蘇演說之後所醉心的。我想給這一類商店取名為「流氓的幻想」。描寫那一切擺在他櫥窗中的東西，是令人厭惡的、可恥的！……

這幾天裏我會見過一位美國的作家。話題講到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我的對談者想了一下說：「這一切不是這麼簡單。不該忘記，大多數的普通美國人對於民主制度是深刻愛好的。當然，罪惡的宣傳有它的影響。由於這種宣傳，普通的美國人便看不出，事實上我們已離民主傳統多麼遙遠。但他們依舊天真地相信合衆國是世界上最進步和民主的國家。他們沒有忘記，我們不久前還跟法西斯作戰過，他們是不能容忍法西斯主義者的。自然，我們反動派的口號，與希特勒的口號大有差別。希特勒直接對德國人說：『我們要把戰爭打到隣國的身上去，從他們那兒取得我們必需的生活空間。』」

我們的反動份子，認為最好是用另一種話。他們不說他們想奪取希臘。決不！他們說我們應當解放希臘人並給他們以民主。他們不說他們想把西歐變為殖民地。決不！他們說他們要協助鞏固西歐的民主制度……。」

六 「美國進步公民」

「爲什麼不能一起過日子」

聯合國大會熱烈辯論政治問題的那幾天，在長長的、陰森森的會場走廊上，什麼人你不能碰見呢！這裏有來自各大學的雄糾糾的青年人，他們穿着花格子的上裝，袖子是淡藍色或深紅色的；有枯瘦的修道女，癡着一張瞧不起人的嘴；有附近各工廠裏肩膀寬闊的技師。有些人來這裏，純粹出於好奇；另外一些人是想找人簽名；還有些人是誠心誠意想知道這裏的事情。

在十月裏的一天，這裏來了一個色調非常鮮明的人物——一個身穿拉鏈牧童裝、長得很結實的小伙子，穿着長統靴，戴一頂帽邊翹得神氣十足的帽子。他站在購買安全理事會的入場券（來賓可以入場用無線電耳機聽取政治委員會的會議報告）的行列裏，同隣人們談論着他的印象。

「給你講，真見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用了那種慣於跟遠處的朋友打招呼的牧人的高而尖

的聲音說道：「爲什麼我們不能在世界上和蘇聯一起過日子？人家說，他們全是愛吵架的人，又說，一切過錯都在他們的葛羅米柯身上，因爲無論什麼事，他總不肯同意，老是說「不」呀「不」的。可是我們在瓦約明，已經養成什麼事都要自己動手摸一摸的習慣。所以我決定坐車來紐約，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是今天早晨來的，我問人家葛羅米柯在那兒。據說還沒有來。好吧，我是個不餓的人，我可以等候，他媽的！我坐着，等着。我看見：好極了！幸而我沒有離開這地方：葛羅米柯！我是從報上的相片裏認識的。的確，是這麼陰沉沉的、容易發怒的樣子，我對他大叫「哈囉，葛羅米柯！」他轉過身來。你猜怎麼，他微笑着！向我招手：「哈囉，孩子！」我走到他面前。於是我說：我從瓦約明來的，我想知道是什麼原因，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在一起過日子，爲什麼你們俄國人常常說「不」，真的不能和你們談判嗎？他哈哈大笑起來。唔，他完全像我們的年輕人那樣，他身上沒有絲毫鬼相。他看了看錶說：「我現在很高興跟您談談，但是馬上就要開會了。維辛斯基在那兒演說的。您去聽聽他的演說吧，您一定會明白的。」好吧，那我就去聽它一下，跟着就到這兒來了，真他媽的見鬼！噫，你們往前走呀，幹嗎隊伍動得這麼慢？……」

在政治委員會的熱烈的例會上，蘇聯代表團把戰爭販子們的計劃又一次輝煌地揭露了。會後我在走廊裏面聽到了熟悉的尖厲的聲音。那位從瓦約明來的牧童，急急忙忙地推開大羣外交家、新聞記

者，來賓，對一個人大聲說道：

「唔，我跟你說過——這些俄國人，都是好人！跟他們是可以談判的，他媽的！」

現實的政治課堂

另一次，會場裏面出現了兩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帶着同樣的帽子，胸上掛着同樣的圓徽章；她們帶着所謂「華萊士鈕」。這些徽章上，有美國前副總統的肖像，是去年秋天加利福尼亞擁護華萊士競選的人們普遍散發的。原來，這是兩位從舊金山來的理髮店主。她們的小「生意」經不起理髮托辣斯的競爭，而垮了台。兩位老太婆從西海岸流落到東海岸；也許，這裏命運會降福她們！但有趣的並不是這件事的本身，而是這兩位理髮店老闆，決定利用她們破舊的福特車，旅行全美，以便……宣傳反對獨佔資本，擁護華萊士。只要對美國的政治風習略知一二的人，便會明白這兩位善心的婦人是決定幹一樁多麼艱苦的偉績。「美國軍團」的好漢要愚弄她們，流氓把牠們身上的「華萊士鈕」扯去，「善意地」奉勸她們「丟掉這個髒東西」，然而她們却頑強地繼續說自己的話，在每一座城市裏都有人聽她們演講，並且點頭表示同情。

據說，這類事情對於美國是很新鮮的。據說，還在不遠的時期，普通美國人還認為最好是不談政

治。他的興趣不超出工資、跟朋友喝酒、星期郊遊的範圍。懂得比較多而有文化教養的美國人，對於政治多少帶些厭惡，認為它一下子便會永遠出賣給某一獨佔資本集團的僱傭保鏢了。「我投驢或象的票，結果不都一樣？他們兩個都是二而一的！」——人們作了這樣的判斷。

可是現在却很明瞭，許多美國人已對政治開始感到興趣，現實把他們引入了政治鬥爭，他們認識，必須給蠻橫的反動派以反擊了。例如，我前面描寫過的「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案件，已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多麼洶湧的怒潮！記得一九四七年十月底，有廿六位「電影明星」，爲了要在華盛頓和紐約，抗議醜惡萬端的迫害大羣劇作家和導演的陰謀，拋開他們自己在好萊塢攝影場中的事業，而穿越大陸。美國人看見他們所愛戴的新人：國內優秀的喜劇演員、著名的舞蹈家和歌人、有才能的話劇演員，這次輪到他們作政治演說家了。「我們要保衛好萊塢！」——在這個口號之下，「電影明星們」作廣播演說，召開羣衆大會，要求解散爲非作歹的湯麥斯—蘭金委員會，和恢復美國的公民自由。

學生、工人、農民們在合衆國各地的羣衆大會上演說，響應這些電影演員的演講；在著名的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二十六名教授中，就有二十二名在這幾天向杜魯門呼籲，要求立刻取締「非美活動委員會」，及取消「忠誠檢查」的法令。

⊙ 顯是民主黨黨徽，象是共和黨黨徽——原註。

教授們忿怒地寫道：「美國政府應當拒絕做這般魔鬼們的尾巴，應當實行民主政治。假如迫害信仰不停止，國內便會出現種族、宗教、以及其他種種盲從；假如任它全力發展，那麼這種盲從便引起足以完全消滅公民權利的不能容忍的浪潮。」

顯然，對這一切現象，如果我們評價過高，或評價過低，都是同樣有害的。這裏有許多僅僅是情緒上、感覺上的結果。絕不能以為，所有那些抗議湯麥斯委員會所作所為的人們，今後也會參加反對反動派的鬥爭。我們現在舉個例子，便足以說明這一點。電影寡頭們在他們的「法律顧問」貝倫斯參與下，決定立刻把好萊塢的一些進步份子解僱，並且聲明說：「我們不願僱用共產黨」，其目的是要幾位參加過不久之前的好萊塢工作人員改治示威運動的人們，聲明悔過。但無論如何，這種示威運動並不是白白舉行的。

「工人成就」

在美國，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們，一切擁護恢復羅斯福「新政」的人們團結在自己的隊伍裏來的「第三黨」，還沒有正式成立（譯者按：該黨現已成立，並已推華萊士為總統候選人，參加一九四八年的競選，作者寫此文時，尚在此事之前）。然而，全國各地現在已有這個組織，並且有密佈的進步

組織活動，他們的隊伍也在日益壯大。不久前不是在伊利諾斯州已成立了「進步黨」嗎？而在芝加哥選舉法官的時候，他已獲得了合衆社所說的「驚人成就」：七十萬選民當中，有十三萬三千選民投票擁護這個年青政黨的候選人。不久以前，有三百位「進步黨」的代表去找華萊士，並且把伊利諾斯州十萬公民簽名的紀念冊交給他，這些人都是希望他就選總統的。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活動的，有「獨立進步黨」。他的一萬名積極份子不顧反動組織的迫害，組織了二十萬人擁護華萊士競選總統的簽名運動。在明尼蘇達州，前州長領導的「民主農民勞工黨」也支持華萊士。在紐約州，「美國工人黨」也對華萊士加以支持，雖然工會的領袖們表示反對。最後，也不能遺忘那戰後由幾個自由組織合併之後產生的，密佈各地的「美國進步公民協會」。這個組織的會員，據一九四八年一月第二屆大會上統計，已把美國四十八州的七五〇個城市和鄉村團結起來了。同時據報告說，「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的會員人數，當時約有十萬人。在他們的科學與藝術支部方面，已把進步的知識份子（作家、科學家、藝術工作者、擁護羅斯福「新政」的人們）團結在自己的隊伍中了。各支部有一萬五千人工作。目前人數還不多的美國共產黨，不管嚴峻的法律壓制，它漸漸在各工人中心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在反對反動勢力的鬥爭中，漸漸地形成了民主勢力廣泛的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的口號，便是恢復現在被美國統治集團所蹂躪的羅斯福政綱。雖然官方宣傳對於羅斯福的名字閉口不提，而且法西

斯的無恥小報正在譏諷他留在人們心中的記憶，但他在美國人民羣衆中享有廣大的聲望。

羅 斯 福 不 死

去年秋天，在百老匯一家一流電影院——「環球戲院」——中，一部不大有名但却是獨立無羈的「托拉」電影公司發行的紀錄影片，整整演了一個月。影片的名字叫「羅斯福的故事」。這片子是進步的電影工作者馬丁·列文和奧利佛·蓉格爾剪輯的。他的編輯顧問是故總統的兒子伊利奧特·羅斯福。據說，演出同人會遭到巨大的財政困難，因爲任何一家大電影公司，如果不願與政府拉關係，而想得到政府的支持，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觀衆却多麼溫暖地接受了這部電影！當羅斯福在銀幕上出現時，鼓掌聲是多麼熱烈！列文和蓉格爾蒐集了許多最珍貴的畫面，差不多把故總統的全部傳記重現出來（自年輕的羅斯福剛開始他底政治生涯、担任威爾遜總統的一名同僚時開始）。在這部影片中，編進了許多反映近三四十年來美國生活中最重大政治事件的紀錄片的景頭，特別是三十年代可怕的經濟危機。這些場面揭穿使幾百萬勞動者遭受痛苦的真正罪人，便是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及其政治代理人。

在整部電影中，每一個場面上都響着那跟隨羅斯福的象徵的主角之聲。這些主角是：人民、普通

青年、普通姑娘。反對派竭力鎮壓，他們爭吵，互相辯論，並且與羅斯福論爭。普通青年和普通姑娘們，經過了長而困難的道路，終於認識了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生活法則。最初他們沒有看出自己的真正敵人，他們不滿意羅斯福，後來他們開始覺得，黃色出版物的撒謊宣傳弄花了他們的眼睛；他們成爲羅斯福的擁護者了。

這裏有幾個購危機年代的景頭，其中伴隨着普通青年的非常痛苦而含着諷刺的聲音。在紐約區的空地上，失業者的可憐的草房子……「你們看，我們的日子過得多麼奇怪！我有房子。不錯，盥洗設備是很壞的，但我沒有毛巾，所以我也需要它……」意氣消沉的人們，披着一身破爛，蹣跚地踱到流動的公共廚房那兒；爲了一碗粗飯而排成一個無限長的尾巴……「我散了步。以後我們就走到我們這間可愛的飯廳來了。我們是這麼喜歡它，以致於我們願意去排兩個鐘頭的班……」標語：「失業的人們，走吧！」「沒有工作！」職業介紹所旁邊的一大羣人。這時銀幕上傳出了當時胡佛總統的空頭諾言：「好日子快來了！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太大的難事。必須稍加忍耐，一切都會恢復常態的。」可是危機仍然如火如荼……

觀衆對於這些場面，不單是當作歷史贈物而接受。他們從這當中看見了自己的明天，他們懂得了爲什麼通貨膨脹不斷增加，物價瘋狂跳躍。他們懂得現在掌握着政權的人們，要把美國拖往何處去。

對於羅斯福與黑暗反動勢力之間的尖銳政治鬥爭場面，觀眾們的反應顯得特別活潑。爲了要破壞他的聲望，故總統的敵人們，什麼卑鄙的謠言不會用過呢！現在羅斯福親自上了演說台。他的臉孔是安詳的，只有閃閃發光的眼睛，證明他被多麼深刻的憤怒所抓住。他心平氣和地，不急不忙地發表了演說，以最強有力的武器——譏刺的武器——打擊他底敵人：

「共和黨員譏諷我，我底家庭，我底孩子。他們對我和對我家人的攻擊，我不打算答覆，但我必須要爲自己的狗辯護。一批人說，用驅逐艦把他送來送去，使國家化了三百萬，另一批人說這項數字是五百萬，第三批人又說是二千萬。在這種說法以後，我底狗已決不是從前那隻了。我應當爲牠辯護

……」

羅斯福講話的羣衆，立刻發出熱烈的喝采與笑聲。而在這家電影院小小廳堂中的觀眾，也跟着喝起采來。

總統死在戰勝希特勒德國的不久之前。他底葬儀匯成浪潮一般的民衆示威運動。人民在哭泣着故總統。他們將自己的希望，寄於他最親近的戰友、民主制度的保衛者、反動派的仇敵。銀幕上現出亨利·華萊士、費奧列羅·拉加第亞。影院的廳堂裏又發出了熱烈的掌聲。這已是一種政治的示威，因爲大家知道的，羅斯福的老戰友，在治理國家這件工作上，他們現在已被攆走。費奧列羅·拉加第

亞也逝世了。但亨利·華萊士則在繼續鬥爭，幾百萬進步美國人的希望現在都放在他的身上。

人 民 的 聲 音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我參加了華萊士主持下的「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紐約分會的羣衆大會。「美國進步公民協會」以這個羣衆大會，準備爲競選總統運動開闢一條道路。它是在紐約最最大會場——可以容納好幾萬人的麥迪遜廣場——上召開的。這完全是美國的、鮮明的、多少有些戲劇性的、充滿着力量與表現的羣衆大會，我闡詳細地講講它，因爲像這一類的羣衆大會，對於美國廣大人民羣衆現在的政治情緒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規模宏大，中央有一個講台，周圍有好幾層樓的會場，照射着像一條條河流似的刺目的燈光。講台中間有水銀燈照着的桌子。上面懸着大幅的美國國旗。鋪着白絨布的桌子，放在四邊是紅條——這是國旗的象徵——的藍色地氈上。沿着樓邊盡是標語：「團結起來，爲進步而鬥爭！」，「鬥爭的時候到了！」，「打倒塔虎脫——哈特萊法案！」。

今天是華萊士會在去年秋天引起同樣喧騰的那次極有意義的演說的週年紀念。當時還是商務部長華萊士，在那次演說中抨擊了以挑撥美蘇糾紛爲目的的美國侵略性對外政策。在這次演說之後，華

萊士被迫離開商務部長的職位。

巨大的麥迪遜廣場，被人們擠得水洩不通。馬隊警察在入口處守衛着。人們不斷湧來，把過道及樓梯擁塞得滿滿的。這裏有工人、公務員、小商人、軍人、許許多多的黑人。大會馬上就要開始了。會堂裏的燈光漸漸暗下來，水銀燈也熄滅了，突然擴音器的聲音，響徹了整個會堂：

「你們討厭失業嗎？你們討厭少數人發財、多數人窮困嗎？」

「是的！」幾萬個聲音響了起來。

「你們討厭塔虎脫和哈特萊嗎？」

「是的！」幾萬個聲音又響了，暴風雨一樣的掌聲，震裂着會堂的空間。

「你們要挺身起來鬥爭嗎？」

「是的。」會堂裏也是萬衆一心的回答。

「這是『進步美國公民』說的話！」擴音器滿意地作了結論。

會堂裏又射出燈光，照着已站着第一位演說者的講台。政治活動家、藝術工作者、公共團體的代表，一個跟着一個地出現了。他們指出美國反動派的罪惡，號召羣衆要緊緊地團結起來，阻止法西斯的威脅，反對反勞工法案，反對「忠誠檢查」，反對種族歧視，反對華爾街派到華盛頓的使節們所推

行的對外侵略政策。

大會進入高潮的時候，兩位年青的劇人走上講台，其中一個手裏抱着吉他。他們唱出一支流行於工人中的諷刺小調：「塔虎脫和哈特萊，拿出良心來！」這支歌引起了兩個工人的爭辯。一個硬說：「政治，政治……我不喜歡政治！」另一個對他解釋，如果不談政治，最後你就會幫助法西斯取得政權：「請回想一下希特勒！他也是從小人物開始的！」

在演說的一段休息時間，參加大會的人們，熱烈而踴躍地通過一項關於當前最迫切的政治問題的決議，擴音器一再響徹了會堂，報告「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的政治綱領。

著名的黑人歌唱家及劇人保羅·魯濱遜，受到人們的熱烈喝采。這位具有罕見藝術天才的人，可說是世界上最好劇場中的真正裝飾品。然而，魯濱遜爲了政治活動，犧牲了他自己的戲劇工作。他不知疲倦地參加反對反動派的羣衆大會，以「非洲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進行廣大的社會及政治活動。人民尊敬並愛戴魯濱遜，到處都熱烈地接待他。因此，「美國老園們」便因他的政治活動，而報以野蠻的憎恨了。這裏有一件很特別的小事：你不可能在美國弄到一張魯濱遜的唱片，雖然牠的需要很大。獨佔資本的「哥倫比亞」公司[⊖]，已經撕毀了與他訂立的契約……

⊖ 美國有名的唱片公司——譯者。

一位穿淡灰色西裝的大個子寬肩膀黑人，走上了講台，他停了一下，圍在他面前的攝影記者們的耀眼的鎂光，使他睜起眼睛。他作了一個諷刺的微笑，像是知道這些照片反正一張也不會在明天的報上登出來。當大聲的喝采沉靜時，魯濱遜以他那强有力的、立刻以響澈整個會堂的柔和的低音，打開了沉默：

「我很驕傲我現在在這裏，在你們當中……」

他馬上唱了一支揭露美國種族歧視的歌。魯濱遜唱歌的時候，沒有任何伴奏。他唱完了一首又唱一首，從通俗歌曲到古典詠嘆調，從詠嘆調又到普通歌曲。聽衆們聽得入迷了。擠滿了幾萬人的會堂裏，是一片靜寂。聽魯濱遜歌唱，這是很難得的藝術享受。

之後魯濱遜又發表了演說。他憤怒地指摘「自由主義」的「下午報」和「紐約郵報」，發表一批造謠資料，以所謂共產黨威脅，來代替揭發美國的法西斯威脅。魯濱遜說：美國現正站在十字路口；她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羅斯福及華萊士的走向和平的路；一條是范登堡之流的走向戰爭的路。他號召民主力量，在面臨反動派的威脅時，團結起來。

華萊士——人民的希望

最後，擴音器報告華萊士演說。這一位人物，是身負着組織進步力量以對抗美國反動勢力的最著名的角色，是在華盛頓消磨了十三年年頭的羅斯福的戰友。起初他任農業部長，以後任副總統，最後任商務部長。早在戰前，人們便稱華萊士為「羅斯福的繼承人」，這稱呼不算枉然，因為他是故總統最忠實的一位追隨者及「新政」的執行人。

對華萊士表示尊敬的像雷一樣轟動的喝采聲，長久不息。這是一個高個子，在五十九年當中不斷從事體育的文人，看起來他更比自己的年齡年輕得多。他有一堆密密的斑白頭髮，和藹可親的纖細的臉孔，寬大的農民的手，因為他是在愛達華州的農場裏開始自己的生活之路的。他講話很安詳，沒有在感受到反對派壓力時的那種演說家多餘的矯揉造作。

「在麥迪遜廣場演說的人身上，會發生一些怪事的，」他以輕鬆的諷刺開始自己的演講：「可以用我一年前的演說做例子。那次演說會獲得美國總統的同意，一年前，我們在白宮中一頁一頁地讀過它。可是這篇演說却把商務部長變成「新共和週刊」的編輯了……」

當回想起這樁去年的醜事時，會場上頓時對這幾句話回以很大的騷動。而華萊士仍然繼續着他的講演。他舉出許多事實，證明美國反動派的胡作亂為。最後，在提醒禁止公務人員參加他的一次羣衆大會的時候，華萊士帶着憤怒的譏刺口吻說：

「我擇一把自己，要自己相信還沒有睡着！難道這就是四十年前人們教我們相信的自由嗎？難道我們受戰爭販子的擺佈，真到了不能演講、不能聽演講、或者不能讓大家商量商量、以知道真相與渴望和平的程度麼？美國已經真正建立起思想統制了嗎？可以把警察國家強加給我們嗎？我希望我一年以前講的話，變成過時的調子。但是不幸得很，我們沒有絲毫的進步！……」

華萊士指出「在現政府協助下，華爾街準備統治世界」的時候說道：

「如果民主黨是好戰的黨，如果他繼續攻擊公民自由，如果兩黨都贊成高漲的物價和鎮壓政策，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就應當有新的政黨，有自由與和平的黨……」

那些天華萊士還沒有直接提出建立「第三黨」的問題。到了已不能運用一切方法及手段以改變民主黨的政治路線時，他仍然不希望與他們決裂。爲了站在黨員的立場與民主黨的領袖們談判，他開着方便之門。然而，華萊士要民主黨回到羅斯福路線來的一切努力，終於遭遇了失敗。民主黨內部，只有反對極端反動派的少數集團支持他，其中有四十二歲的參議員格林·泰勒，他是在愛達華州冶金工人的積極支持下，於一九四二年當選參議員的。泰勒也像華萊士一樣，積極反對「杜魯門主義」，反對「馬歇爾計劃」，反對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十月二十二日，泰勒參議員在北美各州騎馬作遠足旅行的時候聲明說：他可以在一切邀請他的地方停留，對人民講述美國反動勢力的進攻真相……

華萊士本人，展開了巨大的政治活動。他幾乎每天參加羣衆大會。全美國的任何角落，在北方、南方、西方、東方，都聽到了他的聲音。幾十萬美國人都來參加他的集會。這裏有各種職業的人們，有社會各階層的代表。華萊士在羣衆大會上獲得空前的成就之後，波斯頓的「先驅報」憤怒地寫道，聽華萊士演講的，「不僅有穿絨綫衫的工人、外國人、及各種各樣（！）的學生；而且也有教授及穿着很考究的男男女女，即所謂有教養和貴族階級的代表人士。」

每一次集會後，華萊士會收到幾千封信，寫信的人都支持及贊同他的路綫。

麥利蘭州的一位聽衆寫信給華萊士道：「我底朋友，請你別忘掉一件簡單的事，一切的沉默人們都支持您。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沉默的。」

洛杉磯的一個牛奶商寫道：「我跟許多老百姓談過話。我從他們那兒聽到的東西，很少與「哈魯甫研究所」^①關於「杜魯門主義」及您跟這「主義」鬥爭的資料有關。請您繼續自己的正義的鬥爭。我們是和您一起的。」

達拉斯城（在台薩斯州）的人寫信給華萊士說：「我們沒有聽到人民羣衆中有誰罵您，只有銀行

① 「哈魯甫研究所」，是美國的所謂民意研究所。他靠了玩弄統計數字及事實，而製造種種輿論的資料，以利於美國的統治階級——原註。

家和實業鉅頭才幹這種事。」

到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華萊士聲明他將以獨立候選人的資格，競選總統。因此，建立「第三黨」的任務，便在現實的基礎上提了出來。

美國的一切反動勢力，立刻大肆咆哮，開始正式迫害華萊士。一切被收買的黃色報紙，現在都把火力集中在他身上。一大堆泥濘與渣滓一齊向他傾瀉，說他是……瘋子，叫他為「赤色份子」、「共產主義者」。

大家知道的，華萊士決不是共產主義者。他認為自己是「進步的資本家」，而且多少有一些產業。還在戰前，普及改進玉蜀黍品種的「銅十字農場」，每年已可獲四萬元的利潤。但同時，追隨着羅斯福政治綱領的華萊士，為了實現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一切黨派的政治自由，而澈底地進行鬥爭。他堅決反對華爾街的獨裁者，反對獨佔資本的強盜性政權；他贊成保護中小產者的權利。這就保證他獲得美國中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的支持。廣大的工人羣衆，也同情華萊士，因為他贊成取消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反對獨佔資本家。最後，他在那些將他視為反種族歧視的不屈不撓的戰士的黑人當中，也有很大的聲望。進步的智識份子，是予華萊士以廣泛的支持的。大家知道，華萊士本人是一個創造工作者。他不僅最關切他那已花了十年功夫的植物淘汰學，而且也關切人類學、經濟、及

歷史。他所以成爲大部份由創造勞動工作者組成的「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的一個人物，這不是偶然的。

華萊士及其擁護者，必須克服巨大的困難。我們只要看美國所有的報刊都反對他們這一點就夠了。甚至所謂自由主義者的美國報紙，現在也攻擊華萊士。奇怪的倒是連「新共和週刊」的發行人史屈萊，也主張馬上解除華萊士的編輯職務，並且聲明說，他不願「新共和週刊」變成「第三黨」的機關報……

由這一切看來，美國進步公民對未來競選總統時衆寡懸殊的鬥爭前途，已有清晰的估計。他們心裏明白，指揮着國家機關、擁有無限財源及強大宣傳機構的華爾街的政黨，仍然會控制着大多數選票的。但是，從美國進步力量勇敢進行的鬥爭中，他們知道，他們背後已有千千萬萬完全站在保衛和平與民主利益方面的純良的人羣。